

## 十、侦察敌情 解放海岛

涠洲岛位于北部湾畔，地处北海市之南，遂溪县之西，距北海市 24 海里，全岛面积 24.74 平方公里，居民不足 1 万。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就占据该岛，以此作为侵占大陆和海南的航空基地。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当局在岛上派有驻军一个营。

1949 年 12 月，粤桂边纵队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先后解放了合浦、北海和湛江，扫清了盘踞南路的残敌，解放了南路大陆。于是，作为海南岛前哨地带的涠洲岛自然也就成了国民党残兵的麇集之地，估计当时从大陆逃到涠洲岛的国民党残兵有驻岛一个营，海军陆战队一个连，原国民党南路挺进纵队梁传佳大队的残部及钦廉地区一些伪政府机构和地方反动头子，总数约 700 余人。这些残兵败将占据岛上各主要高地，构筑野战工事，利用村镇房屋为依托修筑明暗火力点，又凭籍港湾内的“海硕”号、“海狗”号 2 艘炮艇和掳掠而来的 300 余艘船只，妄图负隅顽抗。

1949 年 12 月底，人民解放军四十军一一九师奉命从钦、防、东兴集结北海，准备对琼作战，解放海南岛。同时也着手解放涠洲岛的战略部署工作，以铲除北海至海口的障碍。为了渡海作战，沿海部队首先开始征集船只和船员的工作，各部队都设有船工动员科，船只征集科，船只管理委员会等机构。刚解放不久的北海，也在军政委员会的领导下，成立支前司令部，协助正规部队担负征集船只、招募船工、筹备军粮等任务。在征集工作中，由于渔民长期受到国民党的欺凌和洗劫，对共产党、人民解放军还不了解，对征船有顾虑，因此，部队的工作遇到很大的困难。北海军政委员会了解这一情况后，就组织由军政委员会主任谭俊、副主任徐永源为首的工作组，深入地角、外沙等渔村港汊，召集渔民开会，宣传共产党、人民解放军宗旨，落实具体政策，逐家逐户地作说服教育工作。经过深入细致的动员，渔民顾虑打消了，他们对共产党、人民解放军的宗旨和政策也有了深入的了解，于是纷纷表示有船出船，有力出力。在短短 2 个月中，全市征得各类大小船只 311 艘，船 1671 名，还有不少渔民自告奋勇要求驾船参战。部队渡海作战需要的船只和船工得到了解决。

渡海作战部队还遇到另一个问题，就是当时的南下部队多为内地籍战士，不但不熟悉海上作战，而且也没有航海经验，不少战士，一上船就头昏眼花，晕船呕吐，站不稳，躺不牢，吃不下饭，睡不好觉，这些都会严重地影响作战任务的顺利完成。因此，为了克服海上作战的困难，必须进行一系列的海上训练，如游泳、撑船、划艇、掌舵等。而进行海上训练，需要有足够数量的舵工、水手，帮助解放大军熟悉水性，适应海上的恶劣气候和掌握航海技能。这时，北海广大渔民纷纷请缨参战。随后，南下解放大军投入海上大练兵的运动，北海的船工们积极帮助解放军指导员进行海上训练，帮助大军熟悉水性，向大军讲授航海和驾船知识。为了克服战士们晕船、晕浪这一现象，船工就让战士们练“荡秋千”、“走浪桥”及在陆上练旋转；为了使战士们掌握航海技能，船工们让战士们上船学摇橹、掌舵、架帆等。经过3个多月的艰苦训练，在北海广大渔民的积极支持和热心帮助下，不少战士开始适应海上生活，不但克服晕浪现象，而且还掌握了一般的航海常识及海上作战的本领，为完成渡海作战任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当时新组建的北海军分区和野战军第四十军一一九师三五六团担负了攻打涠洲岛的战略、战术部署任务。为了制订切实可行的战略、战术方案，必须要摸清涠洲岛上敌人的火力点、番号、人数、装备等情况，为此，北海军分区先后派黄廷瑶、范先琪等潜入海岛，侦察敌情。

黄廷瑶是个涠洲通，1947年上半年他曾在涠洲岛百代寮村以教书为掩护，进行过地下活动。同年10月，他又带南路游击队打过涠洲岛，因此，不但对涠洲情况熟悉，而且在岛上又有一定的群众基础，是执行这次任务的最好人选。当时黄廷瑶正任解放不久的遂溪新政权县长，北海军分区司令员唐才猷特地将他从遂溪县调来执行这个任务。接受这一任务后，黄廷瑶利用涠洲一个姓李的甲长的三角艇，以商人的身份潜到岛上。在西角村距敌人一个炮楼约100米的地方住下，建立情报点收集情报。

1950年1月，北海军政委员会公安科又派范先琪去涠洲岛侦察敌情，主要任务：(1)摸清敌舰艇、兵力和火力情况；(2)对敌海军范参谋长进行策反工作。原来逃到涠洲岛的敌海军参谋长是陈琪（党员）姐夫叶庆波小时的同窗好友，不久

前，两人在北海聚情，范流露出对国民党大势已去的沮丧，何去何从，举棋不定。因此，这次范先琪带上北海军政委员会给范参谋长的信，信上大意是：“兹派我军政委员会代表范先琪前去谈判，希望范参谋长能识时务，辨大势，率队起义，弃暗投明，回到人民一边，我军对一切投诚人员，保证安全，立功者受奖。”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范先琪和叶庆波化装成小贩从北海乘渔船偷渡涠洲。船刚驶到冠头岭天气骤变，刮起大风，船只摇摆，头晕呕吐，直到第二天晚上才驶近涠洲。接近涠洲时，敌人的探照灯在海面乱射，并听到巡逻艇的马达声，他们的船在夜黑浪大中终于靠岸。范先琪随着叶庆波上岸，摸黑走一段路，进了一个小村。叶庆波敲开一户人家的门，户主叫谢仲谦，叶向他介绍说：“这位是大陆来的范同志，我们要在你这里住几天。”“同志”这个词使谢大吃一惊，范先琪也一愣。叶很轻松地拍着范先琪的肩头说：“不要紧，谢叔是我的心腹朋友。”谢赶紧把范先琪、叶庆波请进屋里，并关上门。谢显得紧张，但很热情。范先琪发觉谢家是大户，不是穷苦人家。住下后才知道，谢仲谦是族长、保长。范先琪责备叶为什么不先告诉他。叶却不在乎地说：“放心吧，政治不可靠，我怎敢把你带来？”

第二天，叶庆波去见姓范的参谋长，范参谋长同意与范先琪见面。第三天中午叶庆波领范先琪来到约会地点——南湾街饭店。踏进饭店，范先琪的心“格登”跳了一下，见里面有许多国民党官兵在吃饭。一个军衔较高的军官独坐一张茶桌，叶庆波立刻上前与他握手寒暄，然后示意范先琪过来向他介绍说：“这是我表弟，来做生意的。”那军官瞟了范先琪一眼，对女招待打个招呼，在台上点着两个手指。女招待马上加了两位茶座。范先琪坐下来，看着这位军官，心想，这就是范参谋长？范先琪没有吭声，等他开口，如果他是姓范的参谋长则应该知道范先琪的身份和来意。可是坐了很长时间，他没有任何表示，只偶尔和叶闲聊几句，叶则不断和女招待打情说笑。范先琪感到不对头，叶是怎么搞的，是不是范变卦了？是不是我中了圈套？范先琪偷偷观察四周，紧张地思索着，又悄悄踩一下叶的脚，叶却反把范先琪的脚推开，似乎是叫范先琪别急。过了一会三人离席，走出门口，范先琪问叶：“这个是吗？”叶说：“不是，不知为什么不来。”范先琪愕然了，

考虑了一下，便叫叶去找范，查清原因。叶走不远便匆匆折回来说：“来了、来了。”叶赶紧把他们领到附近一个客店的房间里，他便在门外放哨。范参谋很不安地说：“真对不起，有一件公务耽搁，不能脱身，来迟了，请多多包涵。”范先琪递上军政委员会给他的信。他看完即迅速地撕毁了。范先琪说明了人民解放军的政策，希望他认清形势，弃暗投明。他没等范先琪把话说完即说：“这些我都明白，你就直说吧，要我怎么干？”范先琪说：“(1)我们需要你们的电报密码；(2)希望你能策反兵舰起义。”范参谋显得很为难地说：“电报密码是徐司令掌握，我很难下手；关于起义，虽说我是参谋长，掌握部分舰艇，但在这个时候，我是本地人，不被信任，每条船上徐司令都安排有心腹。炸几条舰，带着二、三十兄弟返回大陆还可以，要率领起义很难办到。”范先琪说：“不必这样匆忙，危险太大，要等时机成熟，我们相信你。”他们交谈不到半个钟头，军号响了，范参谋赶紧站起来说：“我不能再谈了，现在是开饭时间，回去迟了容易引人怀疑。”范先琪问：“明天是否可以再会面？”他摇摇头说：“白天见面太危险，晚上更不可能，贵方的意思我已明白，我如能做到，我会去做，请范先生留步。”说着便走出客店了。范先琪打发叶庆波先回去，并随这个参谋长走了一段路。范参谋很害怕，很不自然地走走停停，将靠近敌西面军营时，四处张望地说：“再往前走就不行了，太危险了！”范先琪说：“你说我是你表弟，你带我去吃顿饭。”他说：“啊呀，这里合浦人很多，扯起乡亲，很容易露马脚，这样你危险，我也危险。”说着便快步而去。范先琪默默地想，看来得靠自己了。

濶洲街上，到处是国民党残兵，各种番号的都有，许多人把从大陆来的东西沿街摆卖，卖军装的也有，乱哄哄的。第四天范先琪在街上向一个士兵买了一套军装，打听了他的部队番号和长官姓名，装成一个国民党散兵，到各处观察，与国民党散兵攀谈，通过两天的侦察，基本弄清了敌人的军事布置：国民党驻濶洲岛的海军基地分两处，分别在濶洲湾（南湾）的东西两端，东面的是徐司令管辖，西面的是范参谋长管辖；两处海军基地共有八、九十艘舰艇，小型的多，大军舰只有三、四艘；武器多是小口径炮，有的船没炮，只有高射机枪和重机枪；山岗、海滩各险要处共有四、五十个碉堡及火力点，总兵力约 2000 多人。



第五天，叶庆波不知到哪里串门了，范先琪只得一个人行动和回谢仲谦家住。天蒙蒙亮时，谢家的女儿去挑水，发现一群国民党兵突然来村里搜查，并直朝她家奔来。她扔下水桶，跑回家，急急把范先琪叫醒，说：“国民党兵来了，快走！”范先琪急忙跟着她从后门走出，穿过蕉地跑到海边，上了她家的小船。她把范先琪送出海，上了一条渔船。船工姓王，跟谢家很熟，范先琪给船工300元，请他送回北海。范先琪回来后，向有关领导作了汇报，为解放涠洲提供了情报参考。

此后，为了进一步摸清岛情和海情，主攻部队还经常派出机动船队，乘着夜幕的掩护，潜到涠洲岛周围侦察，了解海底情况，如水的深度、潮汐规律、航线走向、敌船进出规律等。这期间如果听到敌炮艇巡逻的马达声，就立刻避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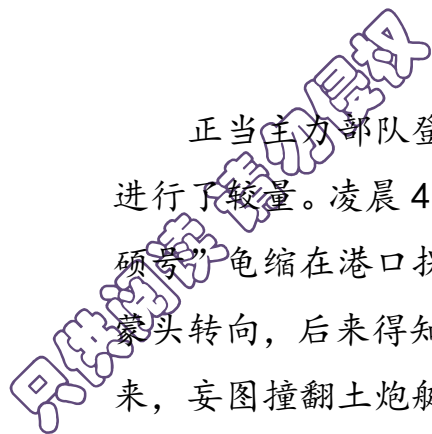
经过一段时间的周密侦察，涠洲地形和敌人布防情况已大致摸清。根据情报，确定涠洲可登陆的地点有几处：一是西角，二是北港，三是涠洲湾等港湾。西角和北港，只有涨潮才能靠岸，低潮的时候，海石外露，难于登陆；由北海至涠洲的木帆船，在顺风顺潮时需6个小时，如果顺风逆潮时需要10多个小时，若逆风逆潮就需要两昼夜。当时敌人的布防以涠洲湾为重点，天主堂村（即盛圻）为辅。西角村和西拱手是嘹望哨。

一切准备就绪后，部队决定向涠洲发起军事行动，以拔除这个解放海南岛的钉子，解放全中国。1950年3月3日，一一九师三五六团配以三五七团一个连及师侦察连，并配备山炮4门、重迫击炮2门、战防炮4门等装备，奉命担任涠洲岛的主攻。作战部队按任务的区分和船只的大小，以连、营编成船队，每排乘坐1艘船，船上配有机枪1挺，营、团属火炮1门，船上配备民工担当的舵手、水手各1名，军工担当的舵手、水手各2名。

3月5日17时，北海海湾升起两颗红色信号弹，在一一九师参谋长夏克的指挥下，船队由高德湾起渡，各船以间隔10米的距离浩浩荡荡向涠洲岛驶去。船队出发不久，天就黑了，但仍继续乘黑夜航行，为了便于联系，各船的船首亮挂红灯，尾部亮挂绿灯。但是由于当晚风大浪急，各船航速又参差不齐，不时有船只与部队失去联系，指挥船不得不前后左右地联系自己的队伍，因此部队的航速很慢，快到天亮了，还走不到三分之一的路程。这时师部接到情报，获悉岛上守

敌已发现了人民解放军的行动。为了隐蔽意图，迷惑敌人，以达突然登陆的目的，师指挥部电令船队到白虎头隐蔽待命。人民解放军船队转航到达白虎头时已是翌日上午7点钟了。10点钟左右，海面上出现3架敌机，嚎叫着往白虎头的海滩冲来，人民解放军船队立刻集中火力向敌机仰射，敌机盘旋了一会，不敢俯冲，拉高遁去。这一天船队就在白虎头海滩抛锚待命。但由于缺乏经验，一些船泊得过于靠岸，退潮时才发现船搁在沙滩上。后来到附近的村庄借来锄头，铁锹挖沙，疏通航道，忙乱了好一会，仍有两艘陷在沙滩里。

3月6日19时，部队再次向濶洲岛快速前进。于第二天凌晨2点左右，先头部队靠近濶洲岛岸。当离岸还有100余米时，被岛上守敌发现，敌人仓皇向人民解放军射击，妄图封锁滩头，这时人民解放军第一梯队船上的轻重武器一齐向敌开火，压住敌人火力，其余各船迅速向滩头靠拢，实行强攻登陆。攻击一开始，登陆部队就从西、西南、南面三个方向向敌发起冲锋。担任主攻的二营五连船队以迅速勇猛的动作插进后背坑以西一侧，在距海岸40、50米时，该连六班长王学林率全班战士跳入齐腰深的水中，向守敌前沿发起冲锋，仅用3分钟就攻占了滩头阵地。团右翼的三营七连也迅速接近海岸边，三排副排长鹿道德率十班战士跳进1米多深的水里，向滩头勇猛冲杀，守敌见势仓皇逃窜，人民解放军登陆部队则紧追不放，顺势夺取了梓桐木及上村以南的无名高地，排长李连祥指挥全排迅速占领阵地，巩固滩头，掩护团主力登陆。这时团首长见先头部队登陆已经成功，一边急令土炮艇全速驶向濶洲湾，封锁海面，以防溃敌逃窜，一边命令一梯队各营迅速登陆，快速地向预定的方向纵深挺进，扩大战果。3月7日凌晨3时许，人民解放军登陆完毕，守敌龟缩在岛南侧各高地负隅顽抗。这时，在西北角登陆的三营五连穿过荆棘和泥泞，直插岛南，攻占了湾仔角北制高点，俘敌27人，缴获轻机枪4挺，同时该营四、六两个连向西攻占了百代寮、斑鸠村一线，形成对濶洲岭的钳形攻势。紧接着他们与五连协同，以火力严密封锁了濶洲湾口。三营到达湾仔高地北侧后，继续向往东北方向逃窜的残敌发起进攻，并在高地西侧与敌海军陆战队交上火。该营九连一排见机沿右翼插向敌后，断敌退路，迫使敌人缴械投降。



正当主力部队登陆与敌展开战斗时，人民解放军的土炮艇也在海面与敌军舰进行了较量。凌晨4时许，首先抵达濶洲湾口的土炮艇“庄得利号”发现敌艇“海硕号”龟缩在港口拐弯处，遂即向其发起进攻。敌艇遭到人民解放军突然袭击，蒙头转向，后来得知土炮艇只是一艘小木船时，便恼羞成怒，气势汹汹地直扑过来，妄图撞翻土炮艇，土炮艇巧妙避开。敌艇企图未得逞，又绕至土炮艇后面，避开土炮艇炮火的正面射击，妄图以优势火力将土炮艇击沉。土炮艇亦迅速调转船头，冲向敌侧翼，但不幸中弹起火，舵柄被打坏，桅杆被打断，情况十分危急。连长石龙生一面组织人员救火，一面指挥战士摇橹向敌舰冲去，在距敌艇20多米时，一声令下，一排排手雷、手榴弹立即飞向敌艇，土炮艇上的各种轻重武器也一齐开火，瞬间，敌艇浓烟滚滚，只得狼狈地向外海逃窜。人民解放军不失时机地控制了港内所有船只，实现断敌海上退路的战略意图。



濶洲岛地图





解放濶洲岛烈士纪念碑



濶洲岛南湾全景

7日早晨7时许，人民解放军登陆部队突破了敌人的防线，进占濶洲岭以东地区，控制西拱手，残敌已无力再组织反击，只得龟缩在濶洲岭上，固守待援。10时左右，人民解放军步兵三五六团以两个营的兵力，向敌发起最后攻击。在人民解放军强大炮火的轰击下，濶洲圩的敌指挥部及主要火力点均被摧毁。在人民解放军强大的军事和政治攻势下，守敌顷刻土崩瓦解，缴械投降。至此，经过8小时的激战，基本肃清濶洲残敌，解放了濶洲岛。

这次战斗共俘获“广东省民众反共救国军南路指挥所”上校参谋甘宗正等436



人，毙伤敌 16 人，缴获各种枪支 556 枝，轻机枪 33 挺，高射机枪 2 挺，炮 5 门，电台 6 部，各种弹药 11 万余发，大小各型船只 300 余艘。战斗结束那天，正值阴雨蒙蒙，南湾街一片潮湿，但缴获的各种战利品堆满了半条街，引来许多群众围观。但张振东、王庆文等 33 位解放军战士在战斗中英勇牺牲。烈士的遗体运回涠洲湾的海滩时，大家都怀着沉重的心情与烈士告别。

## 十一、隐蔽战士传略

### 不懈的奋斗 无私的奉献

——记何醒予

何醒予，原名何翠英，1910 年出生于北海一个工商地主家庭。7 岁时，父亲病逝，由母亲抚养成人。1928 年，遵母命和当地廖某结婚，深受封建婚姻制度的折磨。4 年后丈夫病逝，没有子女，自此终于离开夫家。

何醒予爱读进步书刊，深受革命思想影响，曾和亲戚女友陈锡贞前往广州，名为升学，实为寻访冯道先等革命人士，投奔革命。在广州，何醒予认识了中山大学学生黄道悟。黄是党的培养对象，懂得不少革命道理，在他的影响下，何醒予认识到只有参加党和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才是中国青年唯一的出路，于是决心返家乡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何醒予

1934 年，何醒予回到合浦一中（今北海中学）读书，参加赵世尧、黄铸夫、苏觉民等为首的进步活动。她经历广州这段生活，眼界大开，和庞自、王文崑、

冯廉先、利培源、吴世光、罗永瑛、黄翠玉等，以自己的家为据点，组织“静励斋”读书会，传阅马列主义和其他革命书刊，向同学们宣传进步思想，带动合浦一中大批同学投身革命。

1936年，北海发生九三事件，掀起反日高潮，何醒予积极投身并动员妇女参加抗日运动。1937年以后，她以社会青年名义参加抗日工作，担任过北海妇女抗敌同志会的负责人。1938年4月，在北海抗日统一战线组织各界民众抗敌后援会的推动下，成立“北海妇女抗敌后援会”等3个群众组织，何醒予被任为“妇抗会”会长。她带领北海广大妇女，做了大量的抗日救亡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北海的抗日运动正是方兴未艾，何醒予认识到当务之急是把广大妇女发动起来，形成一股强大的抗日潮流。她与“妇抗会”另几位骨干卢冠群、蔡秀英、邓筱筠等深入街道、工厂做动员工作。工厂的妇女较集中，而且有一定的思想觉悟，女工们大多积极报名参加“妇抗会”；而发动家庭妇女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何醒予等挨家逐户地做思想工作，鼓励她们冲破家庭束缚，走向社会，争取妇女解放。经过不懈的努力，全市有200多名妇女参加了“妇抗会”。

1938年9月，涠洲岛沦陷，经常有日舰在北海、合浦海面一带骚扰，合浦驻军常备中队常年戍守在高沙垄、白虎头一带。何醒予组织会员到街上募集捐款、物资，慰劳爱国将士。“妇抗会”的慰问活动，给予爱国将士极大的鼓舞，何醒予还向他们作言辞激昂的演说，使官兵深受感动。当时，北海时有日机来轰炸，“妇抗会”又组织一个救护队，何醒予兼任队长，她带领队员们分别到壁笆楼（今一幼）、永年医院（今市府二宿舍）学包扎技术，如有战事，即奔赴前线，服务战地。身为队长的何醒予虽因眼疾不便，但她学得特别认真、刻苦，上完课后，队员总是围着她，她也很耐心地手把手地教她们。

当月，何醒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她的思想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她在向入党介绍人卢传义汇报思想情况时说：“人活着，要活得有价值，死要死得有意义，我一生的意义在于改造社会”。这个崇高的信念支持着她，无论在多么艰苦的环境，多么危险的情况下都经得起严峻的考验。何醒予还起了个名字叫“何畏”，表达了对旧势力无所畏惧的决心。

何醒予的家在北海是有名气的有钱人家，又是名门望族，正是地下党掩蔽活动的好场所。她入党后，她家既是北海抗日救亡工作的联络点，又是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站和主要机关。地下党曾在她家开办过党的建设训练班。她热情接待安排各方面来的同志，做好膳食、安全保卫工作，任务繁重。

1939年2月，何醒予被党组织调到合浦福旺乡（今属浦北县），开展建立农村根据地的工作。她遵照组织的指示，和同来的女青年卢冠群利用谢王岗的社会关系，到福旺坡村地主李达三家当家庭教师，以此作掩护秘密从事地下党的交通联络工作。同时，她在村里组织、教育贫苦群众，积极培养进步青年入党，团结、争取上层人士，壮大党的抗日力量。

何醒予到哪里，抗日工作就开展到哪里。她在合浦乐民中心学校教书时，得到该校的教务主任的支持，所教的内容由她选择，她将语文课变成宣传抗日救亡的课堂。学生多是纯洁的农民子弟，很爱戴这位可敬可亲的女老师，一有机会就往老师住处跑，听何老师讲革命故事。有的家长胆小怕事，不让孩子去上学，何老师知道后，就登门去做家长的思想工作，告诉家长：“我们正处于国难当头的境地，每个中国人都要以挽救国家危难为己任。”家长们深受教育，陆续送子女返学。何醒予播下的抗日火种，在这个地区越烧越旺。

1940年，她的视力急剧下降，右眼几乎失明，党组织批准她返北海治疗。此时，北海党组织针对蒋介石掀起的反共逆流，积极组织力量开展斗争，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何醒予的眼疾虽然严重，但她仍想着党的事业，积极参加党组织的活动，冒着随时被国民党逮捕的危险，在北海、高德一带秘密张贴毛泽东签发的关于反逆流的电文传单；为营救被捕的同志四处奔波，出谋献策。她还动员从小江迁回北海开办永祯祥药行的妹妹何娥英建立地下交通站，帮助党组织筹集资金。北海党组织英勇顽强的斗争触动了国民党当局，他们企图将共产党人一网打尽，廉北区委获悉后秘密通知北海的身份暴露的党员撤退，何醒予也在此列。但她不顾个人的安危，凭借她家在当地的名望，掩护了几位同志先撤离，她最后一个离开北海。

何醒予沉着、冷静，具有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在危急情况下敢于挺身而出，



舍己救人。1941年5月，合浦小江（今属浦北县）游击队练炳强队长等3人，到福旺城村找正在地主李达三家当家庭教师的何醒予，了解小江的敌特布防情况。此时的敌人已是风声鹤唳，戒备森严。在村口查岗的一伪兵听出练炳强的口音不是本地人，暗中盯梢至何醒予的住处。掌灯时分，李达三家已重锁大门，何醒予与练炳强队长等正在分析敌情，三、四个伪兵前来敲门，气势汹汹地要检查。练炳强队长等用枪逼住地主李达三，不准他开门。李达三很害怕，见练炳强等来头不小，且又带枪，心里明白此非等闲之辈，不敢声张，只好按何醒予的意思在里屋回答伪兵：此3人是何老师的朋友，从北海来的。伪兵在外磨了一阵，无可奈何地悻悻离去。临走时，要李达三担保，次日早上到乡公所查身份。

这时，情况十分危急，何醒予明白3位游击队员不能在此久留，待伪兵离去，径直到李达三的卧室，要他放走练队长等3人。李达三惊恐万分，怕乡公所次日见不到人，难保身家性命，不予同意。何醒予晓以大义，向李达三宣传共产党的政策，用开明地主援救革命同志的真实事例教育他，劝他不要放弃营救共产党员的机会。但李仍不肯放人。何醒予见软的不行，急中生智，坐近李达三的床头，抽出枕头底的2枝左轮手枪，义正词严地说：“你不放他们，我就打死你，然后我自杀。”胆小如鼠的地主吓得手颤脚震，答应放人。此时，何醒予的身份已暴露，练队长叫她一同撤离，何醒予考虑到自己有眼疾，怕拖累大家，便留了下来。第二天在宋传克的帮助下，何醒予转移到福旺山鸡曲村，但与党组织暂时中断了联系。这期间，何醒予仍然坚持用党的方针政策教育群众，物色、培养入党对象。宋琪英、谢善璋因起义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何醒予虽然当时与他们没有组织关系，但和他们团结一起，互相勉励，增强信心，一边积极向群众做宣传工作，一边积极寻找党组织。

何醒予热爱她为之献身的事业，为革命呕心沥血，恪尽职守，竭力维护党的事业。1943年8月，因工作需要，组织调她到福旺中心小学教书，该校校长是退伍的伪连长，思想反动，经常偷听老师上课，发现有宣传抗日者，加以陷害。同时，该校的封建思想极浓厚，男女界限壁垒森严，何醒予接触进步男老师，遭到校长责难。何醒予曾组织老师与其斗争，但此人在地方势力大，工作因此也难以

开展。组织上看到她的难处，于1944年春调她到灵山平山凌家联保小学教书，何醒予换了工作环境，又以全部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

何醒予秉性善厚，待人热情，在革命队伍中她是大伙的贴心人。她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诚心诚意地对待同志；对患病、负伤的同志，更是倾注深厚的感情。

1944年，合浦中心县委书记黄其江患重病在小江医治，组织上要何醒予负责照料，她二话不说，收拾行装从寨圩赶到小江潘屋交通联络站，与蔡维中、何国达一起照顾黄其江，尽职尽责。

在革命斗争中，何醒予紧紧依靠当地群众，与群众同甘共苦，风雨同舟。她作风朴实，平易近人。她每到一个地方，就走东家，串西家，熟悉每户群众，了解他们的思想情况，积极开展工作。农忙时，她活跃在田间；农闲时，她帮住户烧饭，带孩子，教儿童学文化等，深受群众的欢迎。因她排行第二，大家都亲切地称她为“何二姐”。

何醒予的热情和诚挚，赢得了群众的爱戴，群众象对待女儿一样关心她，爱护她，自己舍不得吃的东西也要留一份给她。何醒予日夜奔波，虚弱的身体每况愈下，却顾不上调养。群众看在眼里，痛在心上，常常想法找些食品给她补养身体。一次，群众很不容易弄来几两猪肉，她虽婉言谢绝，但群众坚持要留下，待群众一离开，她马上送给了正在养病的同志。遇危急情况，群众总想到她的安全，设法为她脱险。1946至1947年间，国民党对山区进行大扫荡，何醒予所在的交通站常遭敌人的袭击。她平时活动频繁，引起敌人的注意。遇到敌情，群众或是赶快替她梳髻换衫，扮成老太婆，给她一担泥箕，混杂在田间劳动的妇女中；或是及时掩护她转移到村外躲避。虽然危急情况经常发生，但都在群众的帮助下，化险为夷。

1947年，何醒予在公馆香山建立交通联络站，负责与各地交通联络站联系。此后，她负责站内的工作，更加克己奉公，忘我工作。1948年，她任合浦公馆区交通站长，下辖浪坡、曲樟乡、白沙乡、南康、石湖等交通站。何醒予对各交通站的工作认真负责，不辞劳苦地往返于各交通站间。从公馆到南康等地的陆路有国民党匪兵、保安大队驻防，行动不便，何醒予则与几位男同志从海上走。为了

不麻烦群众，他们自己找来竹筏，任凭风吹浪打，撑着竹筏赶往目的地，虽随时有落水的危险，但他们毫不惧怕。有一次，退潮时，露出一片泥泞的滩涂，竹筏用不上，他们就行走在粘脚的烂泥中，双脚不时被牡蛎划破，刺心般的疼痛，但何醒予咬牙顶住，坚持走完这段艰难的路程。解放战争时期，粤桂边区部队及游击队的伤员大多撤到公馆香山、浪坡等交通站治疗，何醒予身为站长，组织人员照料伤员，无微不至地关心他们，想方设法为他们找医找药找营养品。每批归队的同志，对这位和蔼可亲的“何二姐”都怀有一种依依惜别的深情。



公馆香山小学旧址——1939年香山党支部、1949年合东南工委所在地

1949年7月，为配合北海解放，合东南工委建立北海情报组，何醒予任组长。北海情报组的主要任务有：一是收集国民党军警特务活动情况，二是筹集一批粮食，以便供给进城的解放大军。在解放前夕白色恐怖的严重威胁下，何醒予带领北海情报组成员，不畏艰险，既与敌特斗争，又与资本家斗争，把收集到的国民党军警特务活动情况及时送出北海，提供给合东南工委：并控制储备了10多万斤粮食，以备支援进城的解放大军，顺利地完成了合东南工委交给的任务。

解放后，何醒予曾在合浦县委、合浦专署、自治区劳动局等部门工作。何醒予的一生，是追求革命不懈战斗的一生。她对革命无私奉献，对战友深切关爱，深得同志们的爱戴。她那艰苦奋斗、献身革命的精神永远激励着后人前进。



## 遭受酷刑 保守秘密

——记苏少芳

1947年6月22日，一群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军警突然将北海法院团团围住，拘捕了一位青年女录事。她，就是打进法院的共产党员，人们传颂的北海女杰“四苏”之一的苏少芳。

苏少芳，1921年出生于合浦县乾体（现环城乡乾江村）的一个封建家庭。幼年随父亲到湛江、广州市生活，就读于湛江市法华小学、广东省立女子中学。1934年，她全家迁返北海后，转学到合浦一中（今北海中学）。她和姐妹们勇敢地冲破封建家庭的束缚，投入青年学生运动的洪流中。她们剪去辫子，留起短发，却受到长辈的无理指责，这更加激励她们鼓足勇气，同封建势力作斗争。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廉州、北海的学生运动迅猛发展，声援和支持北平学生发动的抗日爱国运动。她们姐妹先后参加进步的静励斋读书会，接受进步思想熏陶。



苏少芳

1937年1月，国民党合浦县当局疯狂镇压学生运动，逮捕了冯廉先、伍朝汉、张文纲等进步青年，进行严刑拷打，苏少芳姐妹目睹这一切，更加愤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抗战爆发后，她们热情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在外沙蛋家棚办妇女识字班，到农村宣传演出，到冠头岭搞军事野营，还学习战地救护，准备随时奔赴抗日前线。

1938年秋，苏少芳前往广州参加高中二、三年级女生集训，后因广州沦陷，集训解散。她和部分女同学按照广东省委的布置，参加了省抗日先锋队，奔赴前

线从事民运工作，后转移到粤中、粤北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1939年，她在鹤山县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她和战友们奔走呼号于西江两岸、粤北山区，千方百计唤起民众，团结抗日。

1941年初，党组织调她到湛江工作，起初因故未能接上组织关系，但她仍处处以共产党员的身份严格要求自己，积极为党工作。她一面在北月小学教书作掩护，积极传播进步思想，一面积极寻找党组织。1942年夏天，她又回到了党的怀抱。

从1942年夏天起，苏少芳重返合浦工作，先后在公馆樟嘉小学、沙岗小学、常乐中心小学等校任教，秘密开展党的工作。1946年秋，中共钦廉四属特派员从南路调来合浦，钦廉四属党组织联络机关就设在北海，苏少芳利用堂妹苏少琼（党员）家作为秘密活动地点，秘密与地下党员联系。她一面广泛团结进步人士，扩大党的影响；一面为钦廉四属党组织联络机关送信件和文件。她常常抱病工作，有时还冒着生命危险去散发传单。1946年冬，她肩负着党的重托，打入北海法院任录事，战斗在敌人的“心脏”。

1947年6月，由于廉北党组织联络员廖铎（四眼刘）被捕叛变，出卖党组织，造成苏少芳、苏锡璟、苏俊才等10名党员和3名进步商人被捕。敌人把他们押解到七区专属监狱，多次对苏少芳进行刑讯迫供，残忍地施行电刑、坐老虎凳、吊打、灌辣椒水、拔指甲等酷刑，也丝毫动摇不了她对党的赤胆忠心，始终无法从她口中得到半点关于北海地方党组织的情况。



苏少芳被监禁期间，她母亲梁惠明曾多次去看望她，只见她手脚被扣上大铁链，行动十分困难，身体异常虚弱。一次，狱卒押着苏少芳出来，当着她母亲的面，把她打得口吐鲜血，死去活来，打昏了又用冷水泼醒。目睹此惨无人道的情境，苏少芳母亲的心就像被一把刀子一刀一刀地剜着，她的心在滴血！泪水止不住一次又一次地流出来。确实，皮鞭一鞭一鞭地猛抽在女儿的身上，却是痛在母亲的心里！打罢，狱卒对苏少芳母亲说：“你亲眼看到了，你的女儿是共产党，你不将她所做的事供出来，就要活活打死她。”苏母止住泪水，仍坚决道：“我确实不知道什么，我只知道她过去是教书的，后来在法院工作。”

一年多的监狱生活，她被折磨得非常虚弱，又患了严重的肺病。但面对凶残的敌人，她仍然视死如归，多次对难友说：“酷刑算不了什么，死也是没什么了不起的事”。她以自己的言行鼓舞被捕的同志坚定信心，同敌人斗争到底。敌人见硬的不行，便来软的一套，推出叛徒廖铎出面诱降。廖铎厚颜无耻地对苏少芳说：“现在形势不同了，应该脱离党，转过头来……”苏少芳为了不暴露自己的身份，只是说：“我不认识你，我是老师，后在法院工作，其他的人是我的同学。”苏少芳严守党的秘密，敌人无法从她的口里得到任何口供，也无法从她亲人的口中得到半点线索。

1949年4月，她的身体虚弱至极，病情加重，连行走也很困难，敌人见从她的身上再也不会得到什么情况，只好同意由她的母亲保释她监外就医。她出狱后，党组织安排她在校场疗养。11月底，她的病还未好，就参加了迎接大军解放北海的准备工作。

### 三次被捕 饱受磨难

——记伍朝汉

伍朝汉，1921年出生于北海市一个手工业劳动者的家庭，家庭生活比较困难，自小在北海读书。1934年，进入合浦一中，在读初中时开始接触进步思想，读了些进步书籍。在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掀起抗日救国浪潮，伍朝汉与一些进步同学经常谈论抗日的形势，探讨抗日救亡之道。1936年北海发生了九三事件，伍朝汉参加了北海的学生反日游行，投身到抗日救亡的运动中去。





在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下，伍朝汉和一些同学在学校里组织进步的读书会，传阅进步书刊，积极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怀疑学校里有共产党的地下活动。1937年1月7日上午，伍朝汉和10多个同学被国民党一五九师逮捕，关在该师九五〇团部里。

国民党逮捕学生的目的是想追查共产党，对每个被捕同学逐一审讯、训话。面对敌人的审讯和训话，伍朝汉与被捕的同学或是据理力争，或是反唇相讥，或是义正词严予以驳斥，与敌进行斗争，敌人毫无所获。由于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伍朝汉等人是共产党员（事实上当时他们都不是共产党员），加上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和抗日救亡形势的发展，结果敌人把伍朝汉等学生关了10多天便释放了。伍朝汉第一次尝到了坐监的滋味。

抗战开始时，伍朝汉正开始读高中。随着抗战形势发展，全国兴起抗日高潮，伍朝汉参加了抗日救亡工作，和同学们一起到农村去宣传抗日。那时读马列主义著作成为一种进步趋向，他向赵世尧借了一本《西行漫记》，读后觉得非常向往。1938年，伍朝汉去恩平集训团参加集训，回来后参加了战地服务队，接着参与反国民党顽固派叶天一接任合浦一中校长的活动，后又随校到小江长塘山参加青年抗日先锋队的工作。1939年春，回到大石屯读高二。因为从事抗日先锋队工作，被认为思想赤化，于当年暑假被学校勒令退学。无奈，只好转到廉中去继续读书。

1939年冬，地下党组织伍朝汉和几个同学去灵山石塘监狱探望陈任生老师等人（在儒家巷事件中被捕），陈等人被认为是共产党员遭国民党监禁。同学们当

时并不害怕，说是学生探望老师，带了食品和衣服去慰问他们，伍朝汉站在监狱门口看到陈老师等人，心情觉得又难过又激动，由衷佩服敢于与敌斗争的共产党员。1940年上半年，伍朝汉参加对八路军传单的讨论，同学们推举他做讨论会的主席，这次讨论扩大了传单的影响；伍朝汉还参加小江的米案斗争，反对奸商勾结贪官污吏运米资敌。这些活动实践，使伍朝汉的思想认识进了一步。

1940年7月，伍朝汉高中毕业回到北海，由伍雍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即被派往当时在钦州小董抗日前线的“南九”游击队的政工队工作，参加了中共钦州特别支部。1941年春，由于活动暴露，奉命与钦州特支书记庞自转移到防城工作。1943年调回合浦，开始认识杨甫。

1944年夏天，伍朝汉配合负责钦廉地区工作的中共广东南路特委委员、宣传部长杨甫在合浦廉州阜民北路10号开设永信烟庄，作为中共钦廉四属党组织的秘密联络中心。伍以烟庄掌柜的身份秘密从事党的联络工作。9月22日凌晨，烟庄被国民党特务破坏，伍朝汉与另一店员邓荣存（共产党员）及常出入于烟庄的中共廉北区廉州特派员陈普坤相继被捕。当天，伍朝汉等3人被戴上枷锁，囚禁在国民党合浦保安团部，后被转解到合浦监狱囚禁在专用于囚禁重犯的第二层牢房里，并被套上10多斤重的脚镣。他们被关在阴森恐怖的监狱里，面对敌人的多次审讯，置生死于度外，只承认是做生意的，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没有泄漏党组织的秘密，也没有说过对党不利的话。1944年12月16日，日军从南宁向广州湾转移，途经廉州城，合浦国民党反动派弃城而逃，看守合浦监狱的国民党军警也闻风而逃之夭夭，伍朝汉等3人同狱中难友乘机越狱出来，结束了长达三个月的牢狱之灾。这是伍朝汉的第二次被捕。

伍朝汉出狱后，很快找到了党组织，参加了合浦的南康起义和西场起义，起义后在西场游击队里任文化教员，还随队伍转移到遂溪。日寇投降后又随部队回到合浦，在西场一带活动，后因作战受挫，队伍被打散而失去联系，被迫与一些同志转移到越南，并与从南路撤退过来的党组织取得了联系，继续为党工作。

1946年9月初，驻海防的中共地下党组织派伍朝汉到海防华侨中学教书，以做青年学生的思想工作。1947年6月，伍朝汉及3名同在海防工作的人员因被侵

占越南的法国殖民当局怀疑“涉嫌从事共产党地下工作”而遭到逮捕，并惨遭折磨，饱受摧残。伍朝汉被关在法殖民当局“暗查楼”（相当于国家安全机关）面积约2平方米大的单人牢房里，遭受非人的折磨。审讯时，被反复施以残酷的电刑，两手被接上电线通电，触电时疼痛难忍，倒地大喊；后又被行刑者掀翻，碰得头破血流。但他始终坚守党的秘密，拒不招认自己是共产党员。

一周后，伍朝汉等4人又被法殖民当局转关进一种更为残酷的牢狱——黑牢。4人挤在不到10平方米的黑牢里，牢门只有一小孔，专供狱卒监视；后墙只有两个小铁窗，光线极差，即使晴天也很昏暗，整天关在里面不准“放风”。吃饭时，每人只给一小碗米饭，一点通心菜。没有盛饭的用具，只能用毛巾装饭，用手抓来吃。每餐饭只相当于每人三分之一的饭量。大小便都解在牢房里的一个盆里，每天出去倒一次；因为没有手纸，出去倒便盆时顺便摘回一些树叶当手纸用。伍朝汉等人就在这条件极为恶劣的黑牢里，度过了将近两个月的日子，身心备受摧残。据当地人说，“坐这种黑牢的能坚持两个月就算万幸了，许多人不到两个月就归天了”。

由于查无实据，法殖民当局于1947年11月将伍朝汉等4人“驱逐出境”，移交给国民党广西边防督办公署。之后，伍朝汉等4人被转换了多处监狱，于1948年4月在国民党广西龙州县监狱被释放。这是伍朝汉的第三次被捕。伍朝汉从1947年6月被捕算起，整整被关了11个月；从越南海防到广西龙州，被转关8处监狱，坐了2个月最“黑暗”的黑牢，惨遭残酷的电刑，生命从死亡的边缘挺了过来。

释放后，伍朝汉与同案的人员前往香港找到了党组织，于1948年7月被派回合浦工作。

北海解放后，伍朝汉在北海军政委员会担任文教科长兼管支前工作，曾在钦州县水产局、人大常委、党史办以及地委党史办、处理地下党遗留办等部门任职。

## 交通线上默奉献

——记蔡维中

蔡维中，合浦县常乐镇皇后村人，1918年出生于贫穷之家。7岁时父母双亡，

靠兄长抚养，就读于本村私立小学，高小毕业就失学了。



蔡维中

1932年，刚满14岁的蔡维中离家到北海谋生，先在北海书店做学徒工，继而入新新印务局当排字工人。时逢合浦、北海的学生运动蓬勃兴起，合浦廉中、合浦一中（现北海中学）等校进步学生秘密组织读书会，编辑出版进步刊物，举办平民夜校，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唤起民众抗日热情。在进步思潮的影响下，蔡维中开始追求进步，热情参加承印北海进步青年、学生编辑的《缪丝》、《大风》、《战声》等报刊，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洪流中。

1938年秋，日寇的铁蹄踏进涠洲岛，北海进行大疏散。党组织通过各种关系，动员新新印务局的经理、开明人士陈锡汉把印刷厂搬迁到灵山，联合当地进步力量出版《灵山日报》。蔡维中随厂转移，积极工作，为党占领这一宣传阵地作出了很大的努力。

1939年6月，蔡维中由何国达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冬，日寇打通了邕钦线，进逼灵山。中共合浦县工委再次动员和帮助陈锡汉把印刷厂转移到小江镇圩头山潘屋。蔡维中与厂里的何国达、张其奎及包德彰等党员夜以继日地工作，秘密地为合浦党组织印刷大量的文件、书籍，包括夜校课本、马列著作、革命传单等，推动了地下斗争的开展。1940年4月，他们印刷毛泽东亲笔为延安民众反汪大会起草的《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及八路军通电《告全国人民书》等传单，在全县各地以至毗邻的钦州、防城、灵山、博白等县散发，更加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投降、倒退、分裂的罪行，促进了抗日军民的团结，坚持武装抗日。



印刷厂内建立中共党支部，由何国达、蔡维中等组成，成了合浦地下党的一个重要秘密联络点。合浦县工委（后为中心县委）的领导多次在此召开重要会议；中共钦县特别支部在这里成立并接受上级赋予的重任；一批批南来北往的同志由此中转。为此，何国达、蔡维中等一方面大力开展统战工作，争取陈锡汉、何娥英等对革命的大力支持；另一方面，节衣缩食，千方百计地给领导和同志们解决食宿，同时做好安全转送工作。

1940年6月，合浦县国民党顽固派对白石水区进行第一次军事“围剿”，武装镇压白石水区人民。正在危难之时，党组织指派蔡维中与何国达立即通知小江、龙门等地的党小组组织力量支援白石水区人民的武装斗争。蔡维中与何国达接到任务后马上出发，不畏艰险，跨进洪水浸到齐腰深的小江河牛儿湾，手挽手地一步步涉过了渡口，及时赶到垌心、塘埭等地通知有关人员。后转回潘屋交通站时，蔡维中又受命与包德璋连夜奔赴龙门通知李焯兴等组织力量支援白石水。蔡维中与包德璋马不停蹄地奔走在路上，逢山过山，逢水过水，一直去到龙门向李焯兴传达了党的命令。此时，他俩才吃惊地发现脚趾和小腿粘有几条吸饱了血的大蚂蝗。当他俩赶回潘屋交通站时，天已亮了。这一夜，他俩正好跑了个通宵。

1941年3月3日，日军从海上登陆进入北海市区，烧杀抢劫，无恶不作。当时的敌后抗战工作开展得非常艰苦，党的指示等情报全靠地下交通员传递。党组织要从广州经湛江秘密运回党的新华报、群众杂志等抗战宣传资料。蔡维中负责从湛江把这些资料运回，他经常跑湛江赤坎线执行运送任务。为了顺利通过国民党的关卡检查，蔡维中经常把所带的资料及重要信件物品等搭在路上结交的挑夫的担上，互相轮流挑着重担，结伴而行；待到关卡检查时，借助挑夫的掩护过关。

1941年秋，白石水武装自卫斗争转变为政治斗争后，合浦的形势发生了变化，党组织安排在印刷厂工作的党员撤退隐蔽。蔡维中转移到博白那林一带，时值革命斗争处于低潮，环境条件恶劣，他与何四妈（何国达母亲）一面从事党的交通工作，一面以何四妈变卖衣物所得为本钱经营一些小生意，赚点微利维持同志们的艰苦生活，共度艰难的岁月。

1944年初，蔡维中按照党组织的指示，转移到灵山县平山乡凌家小学，以教

书为掩护从事地下革命工作。同年秋至次年，又奉命先后打进灵山、钦县国民党政府，协助党员黄文法、何国达搞情报工作。钦廉四属武装起义时，钦县党组织负责人卢文指示何国达、蔡维中不参加起义，继续留在国民党政府内搜集敌人的情报。小董起义失败后，何、蔡两人同党组织暂时失去联系，被迫于1946年春转移到越南海防，以公昌行店员的身份开展工作，负责接待、掩护由华南分局与滇桂黔边纵队之间往来的同志，并克服种种困难筹措药品和物资支援粤桂边纵队第三支队。1949年夏天，蔡维中和何国达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回到北海，专事搜集国民党军、政、警、特的活动情报，为解放和接管北海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解放后，蔡维中积极参与北海建设，曾任政协北海市第三届委员会常委、政协党支部书记等职。

## 游击队的义务情报交通员

——记颜大嫂烈士

颜大嫂，1907年出生于灵山县三海乡石龙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925年与圣化乡（今佛子镇）蓬葵麓村颜家茂结婚。颜家和其他劳动人民一样，家贫如洗，吃不饱，穿不暖，受尽官僚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长期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因此，她心里深深烙上阶级仇恨，决心要翻身解放，摆脱苦境。



颜大嫂画像(1907-1948)

1945年2月8日，灵山爆发人民抗日武装起义，点燃了革命的火焰，并很快蔓延到大怀山颜大嫂的家乡。6月间的一个星夜，一阵犬声惊醒了山村的人们，灵山党组织负责人陈铭金和灵山武装队伍负责人莫平凡、黄式高等率领的共产党

游击队来了，给山村人民带来了希望，颜大嫂十分欢喜。从此每逢游击队来，她就热情地接待。经过陈铭金等同志的启发教育，她知道共产党和游击队是为穷人翻身解放的革命队伍，懂得阶级压迫和翻身解放的道理，提高了思想觉悟，树立了革命理想。从此对游击队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为游击队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颜大嫂经常机智灵活地给游击队送情报。蓬葵麓地处深山峡谷，东到古立圩，西去佛子圩，均有 10 多里，交通不便，不易获得情报和信息。游击队的日常用品补给，也不容易。凡游击队需要到圩镇购买的东西，颜大嫂总是千方百计完成，并利用去圩镇的机会想方设法了解敌人的情况。有一次，颜大嫂前往灵山县城为游击队购买日用品，到甘屋村附近的细江桥碰见国民党灵山政警大队曹振甫带领 100 多人向牛芦水那一条路走去，想起牛芦水离蓬葵麓不远，而蓬葵麓还住有游击队 10 多个伤病员，敌人可能要到蓬葵麓去搜捕，便决定把敌人的行动报告游击队。考虑到走大路路程较远来不及了，于是匆匆忙忙抄近路穿过甘屋村，直奔杨家坡村通知交通站杨益金。杨闻讯后马上跑到蓬葵麓通报敌情。游击队得到情报后，立即转移。结果，中午敌人到蓬葵麓扑了空。



陈铭金 1944 年 9 月，原中共灵山县特派员阮明任钦廉四属党

组织的联络员时，宣布陈铭金负责灵山县党的工作。1945 年 8 月，灵山县党组织仍采取负责人制，陈铭金仍任中共灵山县负责人。

1947 年 8 月的一天，游击队陈铭金、莫平凡率 300 多人驻扎灵东白松坪村，并派出小部分队伍到离佛子圩不远的红坭塘村一带筹粮。后来筹粮队伍被敌人发觉，200 多敌人从灵山赶来跟踪“追剿”。敌人到达佛子岭时，筹粮队伍闻讯即边打边撤。当时正好颜大嫂从古立圩回到南木水村附近，闻到枪声便翻山越过血场顶，飞跑到白松坪，上气不接下气地向莫平凡等说：“敌人快到血场顶了。”莫平

凡等即指挥队伍火速出击，抢占血场顶高峰与进至半山的敌人展开激战。由于游击队占领了有利地形，居高临下，猛打猛冲，敌人见势不妙，仓皇逃窜。这一仗打死打伤敌人各一名。颜大嫂立了功。

颜大嫂不但经常向游击队报敌情，还机智地为游击队送信。蓬葵麓村在偏僻的山区，是龙渊、城南、城北游击区互相联系的必经之地，部队来往频繁。很多送往各游击区的信件都经过这里。送信的任务基本都落在颜大嫂的身上。她成了内行的、机智灵活的交通员，多次出色地完成送信任务。如1946年4月下旬，陈铭金在蓬葵麓布置曹琚珍送信给合浦福旺乡大双小学莫子雄。可是曹琚珍不懂得去大双应走哪一条路。颜大嫂知道后主动提出做向导，并说：“经古立圩过福旺去大双路宽好走，但经过福旺有敌人，不安全；应从五练塘经蕉根坪、福通水口、龙眼根到大双，路程既近，又安全。”陈铭金同意颜大嫂的意见。对信件的带法，颜大嫂提出，将信件割成几小张，每张扭成小绳似的，又拿出一条大麻绳解开，把扭成的纸小绳夹在大麻绳里，再把解开的大麻绳拧成原来的样子。陈铭金看后，笑呵呵地称赞颜大嫂聪明机智。

第二天早上，颜大嫂拿出一条扁担，扁担头缚上夹着信纸的麻绳和一只盛着午饭的竹篮，把曹琚珍打扮成挑夫的样子。颜大嫂自己却提着一只手篮，里面放着一些米和红纸包成的“封包”，佯装去“问仙”。两人准备妥当，向陈铭金告别后，向大双前进。在途中两人边走边商量，颜大嫂说：“如果发现敌人检查，我讲去‘问仙’，你讲去担蓝淀（染料）。”当她们过了福通水口，颜大嫂又说：“快到龙眼根了，那里容易碰上敌人，要提防有敌人检查。”不久，果然前面有几个乡丁从月镜垌迎面走出来。想避开敌人已来不及了，她镇定自如，急中生智缠住敌人，以掩护曹琚珍通过。她大步向前走，曹琚珍缓慢行进，有意把距离拉远一点。当乡丁同颜大嫂相遇时，乡丁问她：“去哪里？做什么？”她回答：“去六寮村问仙。”乡丁又问：“手篮装什么？”颜大嫂说：“米和封包。”他们要颜大嫂拆开“封包”检查。颜大嫂有意拖延不拆，慢吞吞地说：“有什么好拆的？”乡丁冒火了，气势汹汹地用枪托撞着手篮，米和封包倒在地上。颜大嫂忍不住，怒气冲气地骂乡丁蛮不讲理。乡丁自知理亏便灰溜溜地走了。当颜大嫂缠住敌人时，



后面的曹琚珍趁机迅速前进，避开了敌人的检查。后来颜大嫂、曹琚珍笑着说：“乡下真是个傻瓜。”她俩继续向前走，沿着崎岖小道绕过六寮村，穿过荒山密林，下午到了大双村，找到莫子雄，完成了重要的送信任务。

蓬葵麓村经常驻有游击队，成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眼中钉。特别是1948年春，老军阀黄质胜出任灵山县县长后，这个刽子手采取国民党“围剿”井冈山红军的手段，推行灭绝人性的烧、杀、抢的政策，对游击队实行血腥镇压，强迫群众搬村，隔离群众与游击队的联系。为了支持游击队，颜大嫂与反动派作坚决的说理斗争，拒不搬出世代谋生的祖地。后来国民党施以捉人、烧屋的毒辣手段，在无法抗拒的情况下，颜大嫂与群众商议，决定搬出一部分。颜大嫂和一部分人明搬暗留，敌人来了则上山躲避，去了则下山种地，继续支持革命。这样蓬葵麓村仍是游击队经常出入的地方。

以前游击队的粮食供给主要来自龙渊、古立和佛子附近的村庄。这些村庄被敌人封锁后，颜大嫂支持革命的担子更重，探敌情、交通联络和粮食供给基本上都落在她的身上。一天拂晓，一位来自城北的游击队员，赤着脚，满身是汗，悄悄地到蓬葵麓村上来，叫醒了颜大嫂说：“昨天部队与敌人激战一天，因寡不敌众而转移。战友们走了一夜到大怀山上，已饿了一天。你能不能搞点粮食送上山去？”颜大嫂明知困难不少，却一口答应了。她想，家里粮食很少了，满足不了部队的需要；桂山村驻有敌人，不能到那里借粮；到圩上购买吗？手中无钱。最后她决定去福通水借“四六谷”（借四还六）。几小时后，颜大嫂挑着粮食上山。同志们见了她，知道粮食来之不易，激动得热泪盈眶，异口同声地说：“大嫂比自己的娘还亲。”

有一次，颜大嫂去佛子圩为游击队购买50多斤米。那时，敌人经常驻牛芦水，这是佛子圩到蓬葵麓必经之道。她再三考虑怎样把粮食送到蓬葵麓，暗想农民担粪桶走路，敌人不会搜查。于是她到桂山村借来一担粪桶洗净抹干，用树叶垫着盛米，中间再加一层树叶，上面用牛粪覆盖。颜大嫂懂得敌人对她比较注意，为了把粮食安全送到，她吩咐习惯到山麓种地的群众挑着粪桶走过牛芦水，她自己却显得若无其事的样子提着手篮跟在后面。结果穿过了敌人的岗哨，安全地把

粮食送了给游击队。

1947年5月的一天，曹琚珍在石山脚战斗中负伤，几个同志护送他到蓬葵麓附近山上的炭窑中隐蔽治疗。蓬葵麓与石山脚近在咫尺，石山脚战斗后，敌人在蓬葵麓一带搜山，山上没有群众过往，曹琚珍等人饿了一天。第二天早上，颜大嫂得知炭窑住有伤员，就不顾个人安危佯装上山打柴。她先爬上山顶观察情况，当发现没有敌人时，立刻下山带几斤米来到炭窑送给曹琚珍等人。颜大嫂担心敌人跟踪追击，当天晚上又带他们转移到南木水村隐蔽。

颜大嫂的行动渐渐引起了敌人的注意。一天，她去佛子圩买油盐 and 探敌情，完成任务回到村里对游击队说：“今天十九佬(叛徒)对我说，‘又有客人来啊!?’”游击队领导听后觉得问题严重，意识到敌人盯住她了。为了她的安全，游击队领导劝她小心谨慎，少到佛子圩去。虽然这样说，而一心为革命的颜大嫂仍继续为游击队找吃的、用的，并多方探听敌情，照样活动。

1948年7月10日，游击队又集中于大怀山下。颜大嫂以为不是圩期，敌人不注意她，身上背着未满周岁的儿子又到佛子圩为游击队购买草鞋、油盐 and 头菜等，被叛徒十九佬看见后，立即密告敌乡公所。敌人在街上捕了颜大嫂。她被迫把小孩放在街上，小孩哇哇地直哭，她昂着头，挺着胸走进乡公所。

颜大嫂被捕后，在乡公所被严刑审讯。敌中队长兰强问她：“陈铭金、梁中光在哪里？共匪有多少人？快说！”这些问题颜大嫂是一清二楚的，但她坚贞不屈，丝毫没有吐露敌人想得到的东西。僵持了一阵，敌人恼羞成怒，使用各种酷刑，将她吊打得血肉模糊，昏迷过去。敌人又用烧红的铁钳烙在她的头上，头发被烧掉不少，脸部皮破肉烂，敌人还是不能从颜大嫂的口中得到游击队的一点真实情况。

一计未成又生一计，敌人绞尽脑汁，妄图利诱她投降。叛徒十九佬和乡长纪成柏亲自出马审讯颜大嫂。十九佬皮笑肉不笑地说：“只要你讲出陈铭金、梁中光等在哪里，还有谁支持他们，不但不杀你，还赏给10担谷！”纪成柏接着说：“对，保证做到。”颜大嫂昂着头，以凛然不可侵犯的英雄气概，斩钉截铁地回答：“要打要杀由你们。我不知道。”敌人的劝降达不到目的。

敌人软硬兼施，威胁利诱都失败了，最后凶相毕露，决定杀害颜大嫂。7月25日，敌人把颜大嫂推向佛子圩头顶刑场。颜大嫂高声说：“国民党反动派末日快到了”，并高呼“共产党万岁！”随着雄壮激昂的口号声，颜大嫂中弹英勇牺牲了。同时被杀害的还有芝麻水村交通员陆十四婶。

颜大嫂虽然被敌人杀害了，但她是为人民而死，为革命而死，死得光荣。她的英雄业绩和高尚的革命精神永远激励着人们。

## 情报交通线上的“梭子”

——记朱二嫂烈士

朱二嫂，合浦县旧州乡（现浦北县大成镇）金街佛花村人，1918年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长大后与吴彩元结为夫妻。她忠于革命，舍生忘死地奋战在情报交通线上，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为人们所敬仰和传颂。

朱二嫂夫妇先后参加了革命。丈夫吴彩元，曾在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四团五连当司务长，因其在家排行第二，连队中算他年岁最大，所以都爱称他为二哥。他妻子姓朱，大家自然称她为朱二嫂。朱二嫂为人正直，落落大方，是一位精明能干的中年妇女。她以农村普通家庭妇女的身份，帮助部队搞给养，四出筹粮，为部队解决了许多困难。

1945年初，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第三支队队长兼政委张世聪率领部队回到金街举行抗日武装起义，在斗争中进行革命宣传活动，号召当地青年群众参加革命，打日寇，打国民党顽固派和地主恶霸，废除苛捐杂税。朱二嫂祖辈受尽旧社会的黑暗统治和压迫剥削，对日军入侵，对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恶霸极为仇恨。于是，她积极响应号召，报名参加了游击队，党组织安排她负责通讯联络工作。当年，张世聪部队在白石水开仓济贫，朱二嫂把粮食运回给游击队。在途经没届铺的地方，被六鸣埭保队拦截，盘问是否运粮“济匪”。朱二嫂针锋相对，据理反驳：“共产党开仓济贫，你知不知道？”“知道。”那个姓郑的保队员说。“我老娘是一个家里的锅头响铛铛的穷女人，自家的日子都过不了，是不是？”“是、是、是。”“那还济什么匪？”驳得那保队员哑口无言，只好给她让开了路。部队最困难的时候，朱二嫂把家里仅有的几十斤大米给同志们煮粥充饥；自己没有米了，只好

天天吃芋头。

朱二嫂入伍后，工作大胆负责，经常冒着生命危险，机智勇敢地穿过敌人封锁线，及时把情报送给游击队，使部队能及时掌握敌情，有效地打击敌人。有一次，她正在亲戚家吃饭，突然接到敌人要偷袭游击队的紧急情报，她马上放下饭碗，把情报塞在篮底的苦瓜内送往游击队。走到半路时碰上两个敌兵，躲避已来不及了，于是，她装着若无其事地往前走。敌人吆喝着拦住她进行搜查，摸遍她全身也搜不到什么，又把目光投向篮子里。朱二嫂意识到情况不妙，便微笑着揭开篮盖对敌兵说：“这是我赶娘家准备的芝麻糕，请你们随便吃吧！”敌兵正好又饥又饿，看见又香又甜的芝麻糕便垂涎三尺，每人抓了几个就狼吞虎咽起来。她趁敌兵忙着吃芝麻糕之机，提起篮子向树木茂密的山边溜之大吉，并迅速跑到交通站通知游击队转移。结果，敌人偷袭扑了个空，乱放几枪就收兵回去了。



后来，朱二嫂的身份暴露了，便转入地下秘密活动，继续担负地下党与部队交通联络的重任。那阳村里建有一个秘密的中心联络站，从佛花到那阳，走直路最多是8里路，但不能走直路联系。绕道要经书房岭、丁村岭才到那阳，路程至少有15里。在这条坎坷不平的山间羊肠小道上，朱二嫂不知留下了多少脚印，磨掉了多少层脚皮。一旦接到紧急情报，无论是白天黑夜，还是刮风下雨，她都毫不犹豫，单枪匹马踏上征途，按时完成地下党和部队交给的任务。敌人扫荡、封村抓人，情况紧张时，朱二嫂孤身一人躲进老鸦山森林里，不知熬了多少个日



日夜夜，处境十分艰难。

朱二嫂虽然具有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气质和性格，但毕竟是位女性遇到的困难不少。为了方便她的工作，赖作亮连长便把她丈夫吴彩元调回地方和她一起工作。从此，朱二嫂与吴彩元互相鼓励，坚持斗争。但不久，吴彩元与朱二嫂又要相互告别，各自执行任务去。朱二嫂仍然一人继续在坎坷的交通线上奔走，出色地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

1948年3月的一天，白石水乡长何承任带领乡丁和护航队100余人突然包围佛花村，把全村财物洗劫一空，还野兽般地蹂躏了一些青年妇女。朱二嫂亦在与敌抗争中被当地乡丁认出而不幸被捕。敌人用皮鞭抽打她，企图威逼她说出地下党及部队的活动情况，但她面无惧色，斩钉截铁地说：“不知道。”她还历数了敌人的野兽罪行。敌人见降服不了她，便兽性大发，撕去了她的衣服对她进行奸污，并惨无人道地割掉她的双乳后将她枪杀。朱二嫂虽与人民永别了，但她为革命视死如归的光辉形象却永远铭刻在人们的心中。

敌人的血腥镇压吓不倒人民。相反，更加激起全村群众对敌人的仇恨，群众更加积极支持革命和参加武装斗争。佛花全村40多人，男青年不到20人，但有9人参加革命部队，在战场上英勇杀敌，先后牺牲了4人。

### 传送情报身陷囹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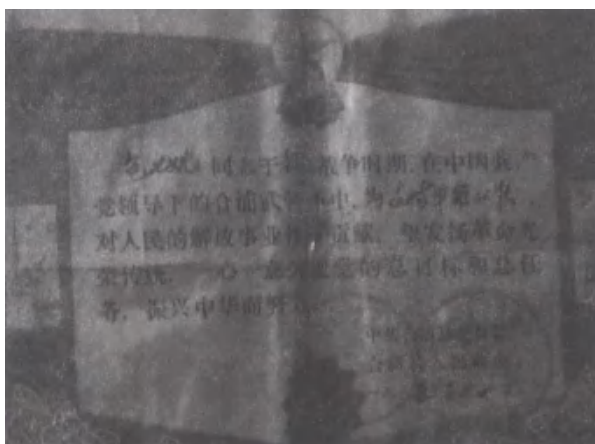
——记包七妈

包七妈，原名庄平，约1896年生，合浦县西场人，西场游击队领导人包恭的母亲，是党的老交通联络员。解放战争时期，她为党组织和游击队做了大量的交通情报工作。1946年秋，她在被反动派封屋驱赶、小儿子饿死的惨境下，仍坚持为党送信。1948年8月间，她前去那丽山区给游击队送情报，被敌人抓回西场审问，后被关押在廉州红庙监狱。敌人使用陪杀（枪毙人）恐吓、夹棍、众人踢、拖地、悬吊、灌辣椒水、跪玻璃碎片、坐老虎凳、吊“半边猪”等多种毒刑，迫她供出包恭及游击队的情况。酷刑使她昏死多次，但她宁死不说。她被敌人打得手脚骨折，血肉模糊，喉咙被勒破，一口牙齿被打掉；但面对凶残的敌人她也只有一句话“死也不知道”。敌人恼羞成怒，更疯狂地对她施以毒刑迫害。在酷刑

之后，她刚醒过来，一个敌兵竟凶残地迫使一个女犯人拉大便灌她，妄图把她折磨致死。幸好一个贫苦出身的狱卒（包基金）暗中照顾，她才得以幸存下来。直到1949年底，在党组织的营救下，她才获保释出狱。



包七妈



政府授予包七妈的交通情报员堡垒户光荣证书

## 追忆在越南的峥嵘岁月

(1946年2月—1949年8月)

——庞自

1945年底至1946年，为避开国民党当局的疯狂“清剿”，中共广东南路特委将无法在当地隐蔽的党员、干部及武装人员南撤隐蔽到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庞自以中共广东南路特委代表的身份驻越南河内，负责南路特委与越共中央之间的联络沟通及对南撤人员的领导工作。本文披露了庞自及有关南撤人员隐蔽越南的部分内幕情况。

1946年2月，农历的正月初四，我和妻子罗英携带3岁多的儿子庞森和不满半岁的女儿庞林去越南。从那时起至1949年8月回国，历时整整3年半。

这次去越南之前，中共广东南路特委委员温焯华对我作了如下指示：(1)让我告诉越方，我部队已出发一段时间了，估计在我到越南时已到中越边境，请越方及早安排；(2)我部队入越后，有什么需要我联系，由部队方面告诉我办；(3)到东兴时，把我与越共联系的情况和特委的意见告诉谢王岗（防城县党组织负责人，住在东兴、芒街），并让谢转告我拟入越的部队；(4)要我到越南后，尽可能在华侨中多建立一些工作关系，以便多安置一些准备撤离的非武装人员；(5)不久将有正式代表去越南与越共中央联系，届时，我的工作将由他安排。离湛江前，我还与符平、李文筹措南方印务局迁往越南事宜，待安排好后才动身赴越。

我们一家从湛江出发，到安铺乘船到东兴，然后从东兴到芒街乘船经海防到河内。在旅途中，从安铺去东兴的船经过北海时，有一批北海客人上船，其中有我们的同学廖毅、方玉英夫妇。此两人过去曾与北海的国民党特务杜子初等有来往，为避免被他俩发现，我和罗英整夜不敢吭声，好在他们上船时已是深夜，船舱灯光昏暗，他们没有见到我们。第二天一早，船到了东兴，我们等别人都下了船才上岸，避免了一场可能引起的麻烦。记得，我第一次去越南而后返湛江时，乘的也是从海防经北海到安铺的船，船也停泊北海，幸好没遇到熟人，但以后不知怎么的，我父母亲知道我去越南两次经过北海，却没有回家去看他们，感到很

伤心。1954年我母亲病危，我从北京回到离别10多年的老家看她老人家时，她已不幸亡故。父亲提起我两次经过家门而不回家时，还颇多埋怨，经我解释后才予谅解。这算是我去越南途中的一段插曲。

我们到了东兴，立即找到黄翠玉姐妹，要了张过境证到了芒街，住在罗英芒街旧居街邻黎九伯的咖啡店里。在黄翠玉姐妹的芒街碗厂见到了谢王岗，之后，杨甫（代表南路特委处理我部队西进与地方党配合的问题）也到我们住处黎家咖啡店找我，我向他俩分别传达了温焯华有关我部队转移越南休整等方面的情况和意见，然后就从芒街乘船去海防。在海防见到了从北海到越南隐蔽的中共党员赵世尧和伍朝汉，我向他们提出开展华侨工作的一些要求，便乘火车到了河内。吴其梅（越侨，曾在合浦一中读书，是赵世尧的同学，后任越共中央国家政治保卫局领导）安排我们住在河内市区西北角的西湖边的一间平房，并给我们找了个叫阿桂的阿姨，替我们买菜、做饭。至此，我们才算在越南安了家。

我在越南工作3年半，大体分两个时期，即战前在河内；战后在越北东北区华侨民众自卫团和越南国家军队独立中团。

## 一、战前在河内

（1946年2月—1947年1月）

从1946年2月至1947年1月越法战争爆发，我以中共南路特委正式代表身份驻在越南首都河内市，负责中共南路特委与越共中央之间的联络沟通工作和对到越南隐蔽人员（南撤人员）的领导工作。这期间，我主要做了如下几件事：

### （一）与越共沟通联络

与我第一次去越南一样，这次我仍然通过吴其梅会见越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黎德寿。我把“老一团”（因我主力部队转移后，南路另立第一团，故撤越的部队通称老一团）将要到达越南的情况告诉黎，希望他能及早安排，我还告诉黎德寿，湛江的南方印务局已谈妥，并将要启运越南，请越方帮助解决印刷厂厂址等问题。关于部队撤越事，黎说此事他们已告知边境各省委作了安排。其实，在我到达越南半个月左右，“老一团”也派来朱澜清、王次华到了河内，并同越共北方局负责人黄文欢联系上了。这是朱、王二人到西湖边我的住所见到我时，我才知道的。



这也说明，越共中央已把安排我撤越部队的事交给越北党委负责了。因此，其后有关撤越部队的事，基本上都由部队与驻地的越南当局（牵涉到中越边境的海宁、谅山、高平三省）联系解决。关于印刷厂方面的事，黎说此事请吴其梅负责解决，于是，我便与吴直接商量处理了。



周楠

1946年6月，中共广东南路特委派陈恩来越南，处理撤越部队的事。我曾陪同他见了黄文欢、黎德寿。8月，南路特委书记周楠以中共华南分局派驻越南联络员名义到了越南，有关同越南联系的事，就由周直接负责处理，我只是帮助周做些具体事务。

## （二）担任周楠的交通联络员

周楠来越南后，我在西湖附近另租了一栋两层楼房（原住的平房，留给原与我们同住的冯德、罗秉全夫妇住）。这样，我家和周家便住在一起。他家在楼上，我家住楼下。周家除周楠外，有他爱人何斌、两个孩子阿萍、阿B和一个阿姨；我们家也是两个孩子和一个姓黄的阿姨。两个阿姨都是可靠的党员，完全是为了党的工作，替我们看孩子、做饭、管理家务。同我们住在一起的还有陈恩，他住在楼上后座（周一家住前座），临时来客如老一团的黄景文、唐才猷，从华南分局来越工作的杨克毅，到河内会见周楠时，也住在这里。

周初到越南，与黎德寿、黄文欢等负责人会面，都通过我约见。有时还由我陪同。以后有时我约见，有时则由越方与周直接约见。国内来人，都是先通过海防方面的交通站，然后或直接找到我们的住处，如前述唐才猷等就是这样；或先到东方印务公司（由从湛江迁越的南方印务局改建的）找到我后，由我转告周约

见，郭芳、谭俊等到河内见周楠就是这样；有些周楠不直接见面的同志，则让我转达意见。如1946年8月，张进焯去越南中部的广南省华侨中学当校长，就是周让我转告张的。当时，张虽身患重病，但见到我时仍很乐观。他本来就天生一副刚毅沉着的面容，这时更显得坚韧不拔，给我留下至今不能忘怀的印象。张后来回国，在解放战争时期重新任合浦县委书记，直至全国解放。张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于1968年患脑溢血而含冤辞世。

### （三）照管《新越南》报

在我去越南以前，越南文化救国会委托吴其梅办了一个石印中文小报《新越南》。该报内容主要是翻译刊载越南报刊有关越南革命和建设的新闻，以及华侨拥护越南革命政府的报道。这是个不定期出刊、八开一张两面印刷的油印小报。我去越南以后不久，大概就在1946年3月，吴其梅托我照管此事。那时，已在那里工作的有冯德（他比我先到越南）、李兴（他是原中共桂西地委派入越南工作的），和一个把越文译为中文的华侨。冯主要负责编写、李主要负责缮写，冯、李都亲自搞印刷。由于天气热，房子狭窄又不通气，工作起来常常是汗流浹背。为改善工作环境，我曾向吴其梅提过几次搬迁，但都解决不了。为此，冯、李颇有怨言。由于这个原因，加上湛江“南方印务局”已迁越，准备办中文铅印报，《新越南》便在我照管一个多月以后停办了。

### （四）参与创建东方印务公司

我来越南前，就在湛江与符平、李文安排好，要尽快将南方印务局职工和全套设备迁河内开办。我到越南不久，南方印务局职工和设备也都到了海防，符平夫妇和李文也同船到达。在赵世尧的协助下，人有了住处，设备也有了存放的地方。这时，我要解决的：一是在河内找可作印刷厂的房子。此事主要靠吴其梅的关系。几经奔波，看过几处房子，最后才与符平、李文共同决定租了间相当宽敞的房子作厂址。二是追加搬迁费和开办费。我第一次去越南时，黎德寿按照我提出的数目，交给我一笔搬迁费，由于我没有经验，所提的这笔费用不够开支；在印刷设备迁来海防后，我向黎德寿提出这个问题，另要开办费。也是由于没有经验，开办费也打得少了。这时，周楠已到国内，我把情况报告周，并经他同意再

次向黎德寿提出增加开办费。问题虽然得到解决，但为此却受到周的批评（主要说我没经验，不会算帐）。

在南方印务局迁越时，恰好华南分局派来的饶华也到了河内。周楠决定派他主持印刷厂和准备编辑出版中文报刊的工作。周还征得黎德寿同意，让饶华代表公方与私方李文共同负责印刷厂的管理。与此同时，越方还派了两个中国同志到印刷厂工作。一个是朱同，另一个是印刷工人，两人都是随国民党军队从云南来越南的，与越南党有联系。其后，在饶华主持下，确定迁越的印刷厂定名为东方印务公司，并立了公司章程，编辑出版了《华侨生活》刊物，开办了承印业务。一切就绪以后，我便不再过问印刷厂的事。但我仍经常到这里，因为这里还是个交通站。同时，《华侨生活》需要送周楠、陈恩审阅的稿件，也由我转交。

#### （五）开展华侨工作

1. 1946年2、3月间，即我到越南工作初期，赵世尧、伍朝汉向我汇报在海防华侨工人和学生中工作的情况，我也提过一些进一步开展工作的意见。4月，陈恩、余明炎、支士强等到了海防以后，这些事便由他们负责处理，我就不再过问了。

2. 1945年合浦起义部队被打散后撤退到越南的庞殿勋、王益，在我到越南以前，经赵世尧安排到北江省华侨自卫团工作。我来越南后，此两人一直由我联系，并接受我的安排。其中曾将王益调回河内一肥皂厂当工人，以便做工人的工作。

3. 通过朱同的关系，认识河内中华中学教员安朗。安也是随云南的国民党军队来越南的，是党的发展对象。我通过安朗了解他在学生中的活动情况，并直接同一些进步学生如刘瞿塘、卢毅等有过接触。

4. 经安朗介绍，认识太原省华侨理事会会长郭良采（郭汉）。郭是个拥护越南革命政权的进步青年。在他到河内时，我曾与他交谈过，并介绍过一些人到太原，请他安排工作。

5. 成立华侨工作委员会。周楠来越南后不久，黎德寿建议成立华侨工作委员会，以统一这方面工作的领导（因当时在越南的中国同志，有从广东南路来的，也有从广西来的和从云南来的，并且都直接同越南党联系，不仅使越方穷于应付，

而且容易出现工作上的不协调)。华侨工委的负责人是周楠，成员有陈恩、余明炎、支生强、庞自（以上是来自广东南路的），陆平、林中（来自广西），朱同（来自云南）。华侨工委只开过一两次会，便无声无息了。

#### （六）应付战争的几件事

1945年9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越南共产党夺取了政权，宣布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国。这时，按照国际协议，在越南的日本军队，在北纬16度线以北地区包括越南北部和越南中部的一部分，由中国军队受降；越南南部和中部的一部分，由英国军队受降。进入越南受降的中国军队，由于国民党准备打内战，于1946年夏便陆续撤回国内，无暇干涉越南革命。进入越南的英国军队，则大力扶植前法国殖民军，开始只在越南南方占据一些城市，1946年逐渐向中部和北部推进，大有卷土重来之势。越法之间的战争，便从小打到大打，从南方发展到北方，看样子，势必发展到全面战争，而首当其冲的是河内。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周楠意见，我做了以下几件事。

1. 迁居。我们在西湖附近租的那栋楼房靠近电厂，不远处有个法国兵营住有法军，考虑到一旦在河内打起仗来，此处极不安全。于是，费了不少劲，在河内通向河东的市郊另租了间房（两层楼房的一层），把家搬到这里。

2. 撤退。战事越来越迫近，在河内的法军同越南守军已发生多起枪战（武装冲突）。为安全计，周楠一家，陈恩、罗英和我们家两个孩子，由我陪同撤退到太原省会太原市。通过我认识的郭良采的关系，他们在这里住了几天以后，周的一家和陈恩撤至我“老一团”集中整训的高平省，罗英和两个孩子则撤到太原省的左州镇。

3. 办国籍证。送走周楠、罗英等人，我仍回河内。按照周的意见，我和还在河内的余明炎，准备在法军占领河内以后仍留下来继续在法占区工作。为取得华侨的合法身份，我通过在河内的王资桐的亲戚，办了我和余明炎两人的国籍证（由国民党政府驻越南总领事馆发给）。



## 二、组建越北东北区华侨民众自卫团

(1947年2月-1949年7月)

### 向胡志明建议组建华侨抗法部队

1946年12月29日，越法战争全面爆发。这时，我们的新居也不安全，我和余明炎便随越共一些机关转移到河东省近郊。由于我们在河内没有多少社会关系，感到继续坚持在这里的作用不大，余明炎提出，战争打起来了，我们还是搞武装斗争为好。我完全同意他的意见。于是，由他执笔，他和我共同署名给胡志明主席写了一封建议信，建议在华侨比较集中的越南北部东北区（包括广安、北江、海宁、谅山四省）组织华侨抗法自卫团。胡志明很快就亲笔在原信上批示：你们建议组织华侨抗法武装，我很赞同。但是，会遇到很多困难的，希望你们小心谨慎，我一定帮助你们。接到胡志明的批复，我和余都很高兴，于是，立即带着胡志明的批示到海防附近华侨比较集中的广安市。省抗战委员会负责人热诚欢迎我们的到来，并向我们表示，不仅希望我们组织华侨抗法武装，而且希望我们帮助消除华侨与越南人民（越南政府）之间存在的隔阂。然后，交给我们一笔活动经费，并答应今后需要经费或其他军需物资，他们都将尽可能帮助。就这样，我们便开始了这支武装的筹建工作。

### 打响抗法斗争的第一枪

广安市横甫县左堆街的华侨比较集中，这里有几个曾参加过防城县人民抗日武装起义的同志，他们与这里的群众有着较为广泛的联系。根据这些情况，我们首先在这里深入华侨村寨，宣传抗法保家，并且很快就组织了黄德权、陈龙师、李平等10多人，有了七、八枝枪。然后，我又到太平省，找到我南路撤越部队原在海防市活动的武工队李锦章（队长）、陆锦西（指导员）等10多人，与他们来到横甫县。有了这样一支二、三十人的队伍以后，便在离左堆街五、六公里处的广罗村，伏击法军军车一辆，打死打伤法军10多人，炸毁了军车，我方陆锦西等3人负伤。这次战斗打响了华侨自卫团抗法斗争的第一枪，也是越南抗战初期在敌后少有的一次胜利。为此，华侨群众欢欣鼓舞，奔走相告，越南报纸争相

报道。继广罗一仗之后，部队又派人化装到左堆街赶集，伺机袭击在左堆街上闲逛的法军少尉军官1名，缴获冲锋枪1枝。这是1947年二、三月间的事。4月又出动小分队袭击、骚扰守卫海防水源的三踏水库的法军，把守敌搞得惶惶不可终日。为了对华侨自卫团进行报复，法军多次出动部队袭击华侨自卫团驻地，在华侨自卫团活动地区南亩一带，出动兵力数以百计，并配合飞机大炮进行扫荡。在反扫荡中，华侨自卫团不但未受什么损失，相反，还利用有利地形，出其不意地打死打伤敌军多人，缴获一批军用物资。自此以后的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法军再也不敢来此处进犯。经过这几次战斗，我们的名声远扬。越南人民军总司令部于1947年4、5月间在太原省召开的一次经验交流会，邀请余明炎和我参加，并拟安排我们介绍经验，后因会议时间有限没有安排。但主持会议的武元甲（人民军总司令），专门提到华侨自卫团主动出击敌人的事，号召越南人民军向我们学习。

#### 扩充部队，消除华越隔阂

自卫团除了开展抗法游击战外，还结合扩充部队，进行广泛的宣传动员工作，特别是加强有关华越人民团结抗法的宣传教育。这是由于华越隔阂有历史根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取代法国统治越南以后，华侨社会动乱不已，既有来自中国方面的土匪流氓，乘乱打家劫舍；又有亲日本的越南走狗大肆反华排华，对华侨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在我们活动的东潮县平溪乡，9个村被烧了6个，杀害12人，抢走耕牛200多头。日本投降、越南独立以后，中国国民党军队入越受降，情况仍很混乱。这时，主要是越南政府中一些人歧视华侨，或把华侨看成都是亲国民党反动派而与越南作对的，或把华侨当成土匪，以“肃清土匪”名义派军队进行“扫荡”。结果，被团结起来的华侨打退，还招致不少伤亡。越法战争爆发后，这里的华侨思想很复杂，他们过去饱受法国殖民主义者压迫和剥削，现在又受到一些越南人的歧视和排斥，面对当前的越法战争，自己应该站在那一边？对此，多数人思索的结果是采取旁观态度，认为谁胜谁败自己都是当老百姓。

针对上述情况，我们组织了宣传队，在横甫县和东潮县一带，深入各村寨，通过与群众交心、开会、演剧、教小孩子唱革命歌曲、写贴标语等方式，揭露法国殖民主义者的侵略野心和罪行，以法国飞机狂轰滥炸华越人民村庄的事实，以

覆巢之下无完卵的道理，号召华侨不计前嫌，消除隔阂，与越南人民一道团结抗法，保卫家乡。通过宣传教育，群众认识到团结抗法是华侨的根本利益所在。同时，从我们的实际行动中，了解到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军纪严明，又能打仗，是可以信赖的，所以，工作不到半个月，就有几十名青年，包括少数越南青年，携带武器参加我们的队伍。到了5月中下旬，自卫团发展到100多人，这时，我们才张贴了第一张布告，亮出了越北东北区华侨民众自卫团的牌子。在这张布告上署名的是团长黎汉威，副团长黄德权，政治委员余明炎，政治处主任庞自。

### 收编土匪和杂牌军

1946年3、4月间，在创建自卫团过程中，我们收编了一股土匪和一伙杂牌军。这股土匪的头子叫廖鸿鸣，这是一伙来自中越边界防城县的匪徒，是乘越南局势动荡来趁火打劫的。这伙人主要抢越南人的东西，有时也抢华侨的。为安定社会秩序，越南政府把他们“招安”过来，并交我们部队收编。原来有二、三十人，收编时只来了10来人，但不几天，受不了我们队伍的约束，除个别人留下外，其余的都走了。5月，我们又收编一伙以国民党旧军人、政客严擎东为首的名为“越南沿海7省华侨自卫团”的几十个人。这个“自卫团”早在越法战争爆发前即已成立，也在我们活动的广安省东潮地区驻防。由于他们搞的是国民党一套，成员无纪律、抽大烟、赌博，花天酒地无所不为，群众瞧不起他们。我们在这一带发动了抗法武装斗争后，这个队伍的一些人来找我们，要求参加我们的队伍。越南政府也觉得严擎东没有什么用处，对他另作安排之后，也决定由我们收编这伙人。由于这伙人多是兵痞、流氓，知道共产党部队很守纪律，怕受约束，绝大部分听说由我们收编后都走了，留下来的只有几个人。两次收编中留下来的人经过教育改造以后，表现都不错。

### 三、 在越南国家军队独立中团

(1947年7月-1949年7月)

#### 从自卫团到独立中团

我们在广西省创建自卫团的同时，入越“老一团”也在北江省组织了名为“越北华侨民众自卫队第一支队（简称越北支队）”，参加这个部队的华侨青年有200多人（战前，我党广西方面的同志如陆平、林中等人在这里做过工作，有一定基础）。1947年7月，入越部队奉命返国参加滇桂边区解放战争。当时被任命为滇桂边区（后为滇桂黔边区）党委书记的周楠决定，越北支队的华侨青年，除部分随入越部队返国外，其余与在广西省活动的自卫团合并。越方知悉此事后向周楠提出，鉴于华侨部队在抗法斗争和消除华越隔阂方面起着重大作用，为进一步加强华侨部队与越南人民军的联系和密切配合，将华侨自卫团改建为越南国家军队独立中团，同时要求入越部队返国时留下部分干部，以加强独立中团的领导。周同意越方建议并与越方商定，在自卫团基础上组建的独立中团，既受越方总司令部及其委托的战区司令部指挥，又受我滇桂边区党委（后为滇桂黔边区党委）的领导；独立中团仍然在敌后和前线的华侨聚居地区负责战斗队（对法作战）和工作队（做华侨工作）的任务，同时，还担负动员华侨支援祖国解放战争的责任。双方还商定，独立中团的给养、武器、弹药、被服等均由越方按越南国家军队的标准发给（实际比越军低得多）。

独立中团组建时200来人，下设两个大队，大队有大队长、副大队长、教导员。中团部设政治处、参谋处、军需处等。中团负责人为中团长黄炳、副中团长黄德权，政治委员庞自，政治处主任方野。

#### 避战祸 痛失爱女

周楠曾指示，入越部队返国后，独立中团可通过在高平省的入越部队留守处负责人郑敦（区党委委员）与区党委联系。据此，在把独立中团组建起来以后，我便去高平向郑敦汇报并听取指示。同时，探望我已有半年多没见面的罗英和孩子们。



去高平前，我已听说我们的第三个孩子已经出生。到了高平，看到罗英和新生女儿都在生病。罗是产后着凉，一直发烧；孩子是早产儿，出生后患肺炎，我到高平时虽说好了，但却瘦得可怜。刚满两周岁的庞林，因打针不慎，针口感染发炎，屁股上肿了一大块。对于带领着3个孩子的罗英，组织上指定一位女同志帮忙照顾，但许多事还是靠才5岁的庞森干。看到家中这狼狈情景，我很不安，决定把这个家搬到独立中团的后方留守处保下镇，这总比在高平好照顾。



庞自（二排左二）与罗英（一排左二）1947年在越南。

同罗英商量后，别的都好说，就是担心这个新生女儿经不起搬家途中的折腾，同时，我们也难以照顾她。因为从高平到保下，少说也有300多公里。那时公路已被破坏，全凭两条腿走路（中团刚成立还没有马匹），我打算搬家时，森儿可以自己走，林儿由我和我来时带的警卫员轮流背，小女儿就由罗英自己背，行李则雇个人挑。但罗英大病未愈，我担心她受不了，也担心小女儿受不了。为此，我和罗英便决定把孩子送别人抚养。当我们把这个打算告诉同志们时，有个在当地参加我“老一团”的姓乔的华侨说，她有个亲戚也姓乔，婚后没个儿女，想抱个抚养。于是，我便和罗英把孩子送到离高平10公里左右的安平镇乔家。这家人果然很高兴地把我们的女儿收下，罗英则再三向这家人关照如何喂养和护理这孩子，然后才依依不舍地离开。我们没有想到的是，只过了3年即1950年，我

们回到云南见到那位姓乔的同志，问及我们送去的那个孩子的情况，她说这孩子身体太差，虽精心照料，还是被病魔折磨死了，她的养母还为此哭得死去活来。此后，我还向知情的同志打听过多次，也都这样说。我们痛心不已，但也万般无奈。

我们决定搬家时，高平战争形势很紧张，几乎每天都有法军飞机在高平省城上空盘旋，有时还扔炸弹，狂射机枪。我们离开高平两天，大概到了北简省的时候，即听说高平城已被法军空降部队占领。我们离开北简向南走了一天多，法军飞机仍不断地从我们的头顶上飞过，说明法军发动的这次战役还在继续扩大。在走到太原省左州附近时，我考虑到北江省城及北江省的主要交通线，早已是法军占领区，我们在北江县保下镇的留守处，毕竟离法占区较近，现在那里的情况不明，将家贸然搬去恐有不妥，于是与罗英商量，她和孩子暂留左州李班同志处（李当时主管越南华侨工作，并负责与我党联系），等我回北江安排妥当后再派人来接她和孩子。经罗同意后，我们便到了左州见了李班，李热诚接待了我们。大约半个月后，我派人去左州接罗英和孩子来北江时，李班还派了原在他那里工作的雪芳姑娘帮助我们管理家务。一直到独立中团结束，雪芳姑娘才和我们分手。

### 独立中团边发展边巩固

独立中团成立后，这支华侨抗法武装就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这时，中团党委决定采取边发展边巩固的方针，放手发动群众，扩大队伍和活动地区。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从2个大队发展到8个大队，活动地区从广安一省发展到北江、谅山、海宁四省，部队由200多人发展到1000人左右。1948年夏，根据斗争的需要成立了两个小团。独立中团的指挥机关，移至北江省陆南县屯木区。

部队的巩固，主要靠继承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从建团之日起，这支部队就注意对指战员进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教育，华侨与越南人民团结抗法，支援祖国人民解放战争的教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英勇牺牲、艰苦奋斗的教育。部队还出版《左峰报》和其他宣传品，通过这些工作，对统一思想认识，提高斗争胜利信心，巩固部队，起着重要作用。

为了较为系统地提高部队的素质，独立中团于1948年4月至5月，在中团

部所在地屯木区的担寺村和岗荣村，各办了一期小队以上干部训练班，每期50人，学习1个月。参加训练班的干部回去后，又在各自的单位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训练，入党的同志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带动同志们更好地完成各项任务，进一步加强了部队的战斗力。

### 打击法伪军

独立中团在发展中，一方面依靠深入群众，进行抗法斗争的宣传教育；另一方面给法伪军以沉重的打击。

1948年秋，独立中团配合越南人民军59、98两个中团，发动了越北东北战役，取得了颇为可观的战绩。首先是打下了被顽固亲法分子所控制的村庄浪滩，击毙了反动头子，从而把这个村的人民争取了过来。接着又在法军据点安详附近的安乐乡，一枪不发地收缴了法军组织起来的30多个民勇的武装，并通过这些民勇提供的情况，协助兄弟部队全歼安详法军。在13号公路，独立中团截击敌运输马车30多辆，缴获了全部军用物资。在4号公路，独立中团与兄弟部队配合伏击法军，击毁敌运输车多辆，炸毁敌坦克4辆。1949年2月，独立中团在法军重点驻守的八者附近的契忍地方，伏击法伪军，毙伤敌伪20多人，生俘13人（其中有法军军官1人），缴获60炮1门，重机枪和步枪20多枝，炮弹、子弹一批。历时半年多的东北战役胜利结束的时候，越南人民军总司令部在祝捷会上，给独立中团颁发军功勋章予以表扬。

就在东北战役开始前不久，独立中团派政治处主任方野与早在海宁县活动的武工队（也是独立中团派出的）会合，随即组建成独立中团的海宁独立大队，经常活动于敌人严密控制的地区锄奸反伪。其中广为人们称赞的是智取南寺屯。南寺屯是海宁县法伪军的一个据点，有30多名伪军。屯的四周布有铁丝网和竹尖签，还有明碉暗堡；平时戒备森严，硬攻难以取胜，因此必须智取。根据这一情况，当大队侦知屯内伪军头子刘某在南寺街开设赌馆，并经常到那里活动之后，便伺机派突击队闯进赌馆，活捉了伪军头子刘某，并命令他写信回屯，佯称从海防运来大米，要屯内所有伪军只带扁担下山挑米。伪军接信后倾巢而出，他们一到赌场，便都成了俘虏。而在伪军离屯后，早已准备好的大队队员随即进入屯内

缴获了全部武器，计有轻机枪 1 挺，冲锋枪、卡宾枪和步枪 20 多枝，手榴弹、子弹一批，大米 10 多包。队员们把武器物资运走并放火烧屯后，便从容而去。被俘伪军，经教育后全部释放。事隔两天，独立大队又袭击另一伪军据点塘花，毙俘伤伪军 20 多人，缴获轻机枪 1 挺，步枪 6 枝，手榴弹、子弹一批。这两次战斗，独立大队人员无一伤亡。经过南寺屯、塘花战斗，附近伪军慑于独立大队威力，便派人前来要求独立大队“体谅”他们，有的还提出“互不侵犯”，“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有的还许诺为我方提供法军情况，广大华侨群众则越来越多地同情以至参加反法斗争。

### 维护华侨正当权益及为之进行斗争

独立中团虽然也打过仗，但无论从自己的力量看，还是从越南方面的要求看，独立中团的主要任务是做好华侨工作，动员华侨与越南人民团结抗法，而不是打仗。为了较好地完成这一主要任务，必须把华侨组织起来，以维护华侨的正当权益。

独立中团有政治工作队，建立小团后，小团也有自己的宣传队伍，每到一处，政治工作队都向华侨宣传华越团结抗法，并发动群众参军、参战或号召群众组织起来保卫家乡，搞好生产。华侨群众组织的主要形式是华侨理事会。理事会一般是从下而上，以乡为单位组织，待有一定基层单位之后成立县的理事会。广安省因建会较早，还成立了省的华侨理事会。所有华侨理事会，都是在越南政府主管华侨工作的华运班、华侨务指导下工作的华侨群众团体。理事会下设有各种群众组织，如民兵游击队、农民互助组、老人会、妇女会、儿童队等，他们在组织生产、调解纠纷、防奸防盗、运粮支援前线、救护伤病员等方面起着积极作用。在一些牵涉到越南政府对华侨政策及政策的执行上，理事会也力求维护华侨的正当权益。但在这样做的时候，却遇到来自越南干部的种种阻挠。独立中团从有利于越南抗法战争和维护华侨权益出发，坚决支持理事会的工作。正因为这样，一些越南干部对中团颇为不满。

1949 年 5 月，主管越南华侨工作的越南中央华侨务（负责人为李班）给我们转来第一联区华运班批评独立中团的报告，并要求我们答复。第一战区是我们活



动的越北地区。华运班是越南党领导华侨工作的小组。一战区华运班负责人宁义藩、高青松原来与我们的关系还是比较好的，我们估计批评独立中团的报告所反映的，是部分越南干部的意见，而不一定是宁、高两个人的意见。这个报告给独立中团扣了很多大帽子，如说中团干部是“封建资产民族主义”，“完全不了解马列主义，因此破坏党的大团结政策”；说我们“参加越南抗战是一种侠义行为，而不当作是国际主义者的义务”等等，帽子大得吓人。

事实上，这些指责都站不住脚。接到上述的批评意见后，我们立即组织班子草拟《对第一联区华运班批评独立中团的答复》，对一战区华运班的指责逐项进行了答复。这个班子包括黄炳、冯德、周剑华，由我主持。现在回过头看，这封信的答复有理有据，基本上是正确的。当然，我们也不是全无错处，如某些事情同越方商量不够，对越方尊重不够等。答复信有些反批评，也有过火之处等。但总的看，真理在我们这一边。

### 支援祖国解放战争

在这方面，独立中团做了如下几件事：

1. 1949年曾先后两次输送了共100多名华侨战士（带有部分武器弹药）去云南，参加滇桂黔边区纵队，对打开边区局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2. 给粤桂边区十万大山思明游击队送去16担武器弹药（部分是中团在作战中缴获的）；帮助十万大山游击队在广南省华侨中募捐越币20万元（兑换为法占区通行的“西贡”币带出）。

3. 代滇桂黔边区党委给中央香港分局交过两次党费，折合黄金3两多。这是经越南政府同意，与一战区经济班合作搞经济工作取得的一部分收入。

4. 在独立中团活动地区为滇桂黔边区党委建立与中央香港分局、粤桂边区党委的交通联络线。通过这条交通联络线往来的有香港分局的政治交通员、区党委委员陈恩、郑敦、杨德华、孙康、唐才猷和边区纵队司令员庄田的爱人、纵队参谋长黄景文的爱人、支队政治部副主任谢森的爱人等，还有电台工作人员等。

5. 1948年冬，从广东南路来的“新一团”500多人，到达中团活动地区休整，中团在衣食弹药补充方面提供了尽可能的帮助。

## 独立中团的结束

1949年5月，已经渡过长江天险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挥师南下追歼残敌。为配合我南下大军肃清仍盘踞在中越边界粤桂边区十万山区（主要在广西防城县和上思县）的国民党军队，粤桂边区纵队派十万大山地委书记、政治委员陈明江来越，由我陪同找到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长黄文泰，经中越双方商定，采取联合行动打开边界局面。为此决定从越南人民军59、98两个中团各抽出一个主力小团，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边区纵队第3支队27团；从独立中团整编一个主力小团作为28团。28团团长庞殿勋，副团长王益，政委罗北，政治处主任张贤，参谋长廖辉。两个整编团由越南第一战区副司令员黎广波率领，于1949年6月开赴十万山区，配合我方作战。中团未编入主力小团的华侨则移交给中央华侨务，重新组建独立小团（后称第10小团），团长是越南人武国荣，政委是中国同志许明（许实），仍留燕子山根据地抗法，直到抗法战争胜利。未随主力小团回国的原广东南路同志，有的调滇桂黔边区工作，如我和罗英、冯德、周剑华、莫伪、叶平等；有的调粤桂边区工作，如黄炳、方野、陆锦西等。开赴十万山区的越南人民军包括独立中团整编的小团，参加了防城县竹山、江坡、茅坡等处战斗，为中国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在27团完成任务返回越南时，经越方同意，28团仍留十万山区继续战斗。至此，越南国家军队独立中团即告结束。

1950年9月，应越方要求，经中共中央同意，将回国参战后编入粤桂边区纵队第7支队20团2营5连的华侨干部战士150人移交给越共海宁省委，由越方重新安排工作，大部分成为越南军队、政府中下级干部，继续为越南的抗法、抗美斗争，为越南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但万万没有想到，这些为越南解放事业流血奋斗的华侨，在越南得到解放后，却于1980年前后被越南政府驱赶回国成为难民。1981年，为落实这部分同志的政策，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务院侨办和国家劳动总局等8个单位发出通知，对他们的工作、党籍、工龄计算等作了规定，使他们得到了祖国适当的安排。

#### 四、归国

(1949年7月)

在独立中团整编回国时，越方原任命我为开赴十万山区部队的副政治委员。由于考虑到越南终非我久留之地，特别是与一战区华运班发生了一场重大争论之后，更坚定了我回国的决心。于是，我便面见当时已进入云南省的滇桂黔边区党委书记周楠，请求调返云南工作。得到周同意后，我即持他给越南武元甲总司令的信回到一战区。我首先向已决定率队赴十万山区的一战区副司令黎广波提出，黎让我去见司令员朱文晋。我找到朱，朱说此事由武元甲决定。这样，我又到越人民军总司令部找武。当时武正在开会，我在那里等了一天多才见到他。为请调回国我又费了一番口舌，武看挽留不了我，便只好让秘书办文告知第一战区同意我调返中国。这是1949年7月的事。

与我们家一起回云南的还有冯德一家，他是北海早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在中团负责编辑山版报纸和文字宣传方面的工作；周剑华，是合浦同乡，当时是中团副团长；莫伪和他爱人，莫是中团军需主任；叶平，报纸编辑和刻写。此外还有警卫员、服务员及小孩共20来人，还有三、四匹马。马主要是驮行李，有时也作坐骑。

我们回云南的第一目标是邻近云南省麻栗坡县的一个叫官坝的地方，我滇桂黔边区纵队有留守处驻在那里。我们从北江省保下出发，走了六、七天，经过太原、宣光、河阳等省，于1949年8月初“八·一”建军节过后几天，才到达官坝。在这里，我们见到了留守处的同志，有的原来认识，有的不曾认识，但不管新老相识，曾经在两地战斗的同志相见，彼此都很高兴。但也有令人犯愁的事，即在我们到达官坝的前几天，国民党二十六军对滇东南地区（现为文山地区）各县进行扫荡。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是留下来等还是继续进入国门。经过考虑后决定，妇女儿童都留下，罗英当时已临近产期，也和孩子们一起留下来。我和周剑华、叶平两个单身汉及警卫员继续前进。与我们一起走的，还有刚从中央香港分局来的政治交通员陈伟。在离开官坝不到10里远，对面来了一位交通员告知我们：敌军已占领了麻栗坡县，对边界严密封锁，此时不宜前往。为此，我便决

定折回官坝等候。但香港来的交通员陈伟，这位可尊敬的有着高度责任感的同志却说，他有紧急任务；必须及早找到区党委，因此他没有与我们一起折返，而是继续前往。事后得知，他就在这次进入麻栗坡我游击区时，被国民党军队逮捕，并在解往滇东南首府文山城后不久被枪决。消息传来，凡认识他的人都为他的牺牲而深感痛惜。

我和准备先行的几个人又在官坝等了几天，敌军封锁边界情况稍缓之后，我们便又起程进入云南。其他人员也随着有先有后进入。罗英于1949年10月2日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的第二天，生下了我们第四个孩子——现在的老三庞松。罗英和孩子们于1950年1月才进入云南，那时，文山地区已全部解放了。

【本文摘自庞自回忆录《人生之旅》（1998年2月付印），略作改编。】





前排左起：朱澜清、陈华、符志行；  
后排左起：邹贞业、谭俊、莫平凡。

朱澜清，1949.10-1950.4，任六万山区支前司令部副政委。

符志行，1949.8-1949.11，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边纵队第四支队司令。

陈华，1949.8-1950.4，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边纵队第四支队政委。

莫平凡，1949.8-1950.4，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边纵队第四支队副司令。

谭俊，1949.8-1950.4，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边纵队第四支队政治部主任。

邹贞业，1949.8-1950.2，任中共合（浦）钦（县）灵（山）边工作委员会书记。

只供阅读 请勿侵权



1949年12月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北海举行入城仪式

历史

资料



人民欢欣鼓舞游行庆祝胜利



庆祝胜利大会盛况



合浦人民欢庆解放后的第一个新年

### 解放战争时期党组织一览表

组织名称	成立地点	起驻时间	常驻地	隶属关系	管辖地区
中共钦廉四属特派员	北海市	1946年9月 至 1948年8月	北海四属	中共广东区委、 后中共中央香港分局	钦廉四属（合、 灵、钦、防）桂 中南（八个县）
中共合浦县工作委员会	合浦县大成 山区	1947年9月 至 1948年9月	大成山区	四属特派员陈 华	合浦县（包括北 海、浦北）
中共粤桂边地委	合浦县多蕉 乡冲掘垌	1948年9月 至 1949年4月	白石水大成 山区	粤桂边区党委	合浦县、灵山、 廉江、北流、玉 林、横县、博白 边境
中共合浦县委	合浦县多蕉 乡冲掘垌	1948年9月 至 1949年3月	白石水大成 山区	粤桂边地委	合浦县
中共六万山地委	合浦县公馆 六湖垌山塘 口村	1949年3月 至 1950年2月	（无定址）	粤桂边区党委	合浦、灵山、钦 县三那、横南、 兴业、永淳、贵 县南部
中共合东南工委	合浦公馆南 山村	1949年5月 至 1950年2月	公馆、南康等 地	六万山地委	合浦县现辖区， 西场除外
中共合中北工委	大成山区	1949年4月 至 1950年2月	大成山区	六万山地委	浦北县现辖区
中共合钦灵边工委	合浦县西场	1949年3月 至 1950年2月	合浦县西场	六万山地委	合浦西场，钦县 三那灵山南部
备注	1、1946年9月起，陈华任钦廉四属特派员管四县，1947年5月，陈华接管桂中南兼桂中南领导人，1948年2、3月钦防分开领导。 2、六万山地委领导下的党组织：合东南、合中北、合钦灵边工委、灵山县委，灵横永边工委，贵兴工委。 3、钦廉四属工委1948年1月成立至1948年6月，管辖合灵钦防，陈华仍管合灵和桂中南。				



# 解放战争时期党组织活动示意图



